



特區政府向中共官僚傾斜的管治

開放大氣電波，捍衛言論自由！

天災難阻 人禍須除

「今年恐怕是中國經濟最困難的一年」

中共對托洛茨基和陳獨秀評價的轉變

悼念李永爵和章華同志

拉丁美洲專頁

特區政府向中共官僚傾斜的管治

仲明

最近，有週刊以「天災人禍、曾蔭權無能治港」為封面標題，一語中的，點出特區首長在目下左支右絀的困境。

曾蔭權的第二個任期開始以後，便連番實施與民意相違的政策，特別在政治和管治的層面。雖然他嘴裡說要以中共標榜的「以人為本」為統治的根本，口頭上以人民的生活為施政的根基；但實際上，這看起來似乎緊跟中央的路線，最終很可能祇是中共官僚式假、大、空在香港的翻版。

民主進程的嚴重缺失

曾蔭權第二屆任期一上任，就向人大作報告，交待他及其一伙的政制改革方案，包括如何及何時實施基本法中所說的普選。結果，人大常委會審議其報告後，就拍板 2012 年沒有任何普選。最快也要等到 2017 年才會有普選行政長官。跟著之後的一屆立法會才會有普選。

事實上，中共式的承諾所謂有普選，說到底，還不知道是那門子的選舉模式。令香港市民十分擔心的是，就在人大常委會公佈相關決定的同時，便先有京官在明示暗示，立法會功能組別的選舉也是普選的一種形式。跟著又有港府憲政官員伴隨着中共官僚的指揮棒，附和說，普選也有很多種形式的云云。

市民看在眼裡，心中也明白到，所謂的 2017 年有普選，很大可能是望梅止渴、畫餅充饑的現代版最佳註腳。隨時會變成中共中央操控的有限度選擇的行政長官『普選』，及仍然有功能組別的立法會『普選』。

一人一票選舉政府公職人員，根本上是最起碼的公民權利。本來，早就應該實施，沒有甚麼需要討論的地方。祇是，由於香港在港英統治的殖民年代，沒有普選的可能。及至回歸祖國之後，市民的期望自然是民主制度可以真正早日實現。於是乎，社會上便有不同的說法；例如，03 年 50 萬人反 23 條立法時，早就有人提出全面普選，隨後又有訴求 07、08 雙普選；後來又有人說 2012 雙普選等等。人們以為，這樣卑微的政治訴求，一項普世的價值，亦即普及而平等的選舉方式，總不成要搞到 2047 年才會出現吧？

但，事實上，無論是有產階級、中共在香港的代理、以至特別是特區政府內的官僚，均事事向北京匯報請示，搞搞偽裝的諮詢程序還可以，到要動真格的時候，便紛紛歸隊，唯北大人馬首是瞻，那敢越雷池半步？這才真正是曾蔭權治下的最高指導思想了，而非甚麼『以人為本』、『急市民之所急』云云。

曾氏吹噓的應聲濫調，通通都是不著邊際的廢話。親疏有別才是他管治方式的重心。親者，當然是他宣誓效忠的北京官僚統治集團。近的，當然是選他上台的八百人小圈子『選民』，亦即香港社會中的富豪巨賈、名流權貴。連最近由他主理的副局長及政治助理聘任過程，也盡顯他的『親疏有別、用人唯親』之道。

他除了學舌般重覆中共官僚的說法之外，有沒有為普選盡點力？當然沒有。他背後的利益集團，上至中共官僚階層、下至本港的商賈，那裡會放過他呢！作秀的時候還可以作親民狀，但到真的要為香港市民爭取民主、免受官僚欺壓、要起來當家作主的時候，曾蔭權連為普及而平等的選舉這樣一個最低要求，哼也不哼半句話。

反加價、反對向市民開刀的政策

曾蔭權在剛過去的預算案內，因着龐大的財政盈餘，因此提出大灑數百億，既為提高其民望，也有助紓解一下美金港元齊貶值下帶來的民間苦況。

不過他不止一次提醒各位市民，這些都是一次性的措施。換言之，曾蔭權對民間疾苦也祇能幫到此而已。

任何一個向人民負責的政府，一個急市民所急的政府，會否就到此為止，貴客自理呢？

市民大眾應該起來反對公共事業加價，反對藉加油價或進口日用品加價等借口，而將通脹轉嫁到市民身上的企圖。另外，更要反對曾蔭權派糖完畢後向市民開刀的政策，例如，任何向市民大眾伸手要錢的醫療方案。

通脹正在不斷上升，食品、日用品的價格急升，令市民深感其苦。此時此地，應該提出薪金與通脹掛鈎的要求，令打工仔的人工不受通脹蠶食。這是最急切的要求。否則的話，市民大眾連最起碼的生活條件也會每況愈下。

另方面，特區政府繼多年前的強積金之後，又再計劃推出被人冠名為「強醫金」的醫療方案。再一次引來批評。很多論者均指出，強醫金的各種方案，就如賦稅一樣，令大多數市民在交稅外，還要加強積金和強醫金，合共起來就是八折支薪。

曾蔭權向市民開刀的政策，不單沒有令社會財富再分配來得更公平、合理，反而令中、低下層的市民深受形同減薪的即時效果。這些倒行逆施的政策，與關心人民福祉相去甚遠。若論真的要保赤安貧，自應立即停止向市民伸手要錢的政策，應該加徵利得稅才是。

反對公共事業加價！

反對向市民開刀的政策！

立即增加公營建設，如醫院、公屋、社區設施等。

實施全面性社會保障！

薪金隨物價指數調升！

二〇〇八年六月二十二日

開放大氣電波，捍衛言論自由！

微波

言論自由是《人權法》和《基本法》規定為人人均應享有的自由權利之一。開辦更多的電台廣播，是行使言論自由的有效渠道，可供民眾收聽更多的不同資訊和意見，打破任何的政治壟斷。

現時的香港，只有3個電台(其屬下共分成不同語言等的11個台)，在台灣，則據說有178個電台。這顯示香港電台廣播的不足，極需開放電台數目。

為了提供大眾多一種選擇，聽到不同的政見聲音，曾健成先生在05年7月中向電管局申請成立民間電台。在遲遲未獲批出牌照近3個月之後，民間電台試播了一小時。06年8月遭電管局查封後，民間電台復播，更遭電管局票控發起人曾健成和4名講者，表明當局企圖強用法律來阻遏民間的發聲。

08年1月8日，東區法院開庭審理電管局的有關檢控。據裁判官游德康指出，《電訊條例》中訂立的電台發牌制度容易令申請人混淆，給予行政機關過大權力，違反《基本法》及《人權法》保障言論自由的條文，他在判辭中明言，「由於權力全歸於行政長官手上，而給他建議的機構又由他一個人委任，這會令人懷疑，他(行政長官)拒絕牌照申請的背後理由，是基於申請人的政治取態。」(見翌日的《明報》報道)但控方堅持這項殖民時代的惡法，表示不服裁決，要向高等法院上訴。在高院審判前，電管局表明，無牌廣播仍然是刑事罪行，可能遭到刑事檢控。高院也發出禁制令，禁止民間電台復播，企圖使用高壓的法律手段來解決政治性問題。

民間電台為了讓電管局修改那過時的《電訊條例》，自願暫時停播3個月，但限期過後，電管局毫無修例表示，於是恢復間歇性地廣播，儘管續播是不依法院的禁制令的，可能會遭檢控，但民間電台的參加者為了爭取開放大氣電波，捍衛言論自由，能夠向大眾發聲，唯有實行公民抗命，以反對現行法律(或條例)中的不公正，以期最後得以改正條例。為此，自願參加的一些講者都表明不懼怕會被判監禁。由此可知，

這完全是俗語說的「官逼民反」，近乎「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執政的官僚們不肯接納市民的正當訴求，也不接受上述裁判官游德康所裁定的《電訊條例》的電台發牌制度違憲而進行修改，卻一方面寄望於高等法院的翻案，另方面則對民間電台更強硬地施壓，對參加廣播的嘉賓進行選擇性檢控，這只會更加劇當局與民眾之間的矛盾，激發更劇烈更長期的鬥爭，在民間電台及其支持者方面，相信將不會半途停止，而必定會鬥爭下去，誓要達到目的為止。

今天，有一位民主派人士已準備另外申請成立「新人民電台」，又有人聯同一些社會知名人士籌集到6千萬元醞釀成立另一個電台，儘管後者的宗旨和性質會大大不同於民間電台，成立後也不會取代民間電台所起的作用，但這也證明香港確實需要開放大氣電波。

民間電台從申辦到今天，已經歷了將近3年的曲折過程，受到了統治者的重重打擊。這說明，爭取開放大氣電波的言論自由，是需要堅忍不屈的鬥志，盡力發動民眾的聲援和支持，以構成社會的壓力，逼使當權者讓步的！隨著時代的進步，民間的爭取，數碼廣播的推廣，可以相信，大氣電波的政治壟斷將會被打破，過時而專制的《電訊條例》將與殖民地箝制言論的傳統一起消逝。

2008年6月1日



天災難阻 人禍須除

振言

地震的破壞

四川省汶川大地震(官方嗣後修正為8級)，造成6.5萬以上人民死亡(國家領導人估計可能達8萬以上人民死亡)，近2萬人失蹤，36萬人受傷，150萬畝農田被毀，農作物直接損失逾45億元，國有資產的中央企業經濟損失300億元以上，特別是43萬多房屋被毀，超過1千萬人痛失家園。

在中央方面，則宣稱，全國財政部門已累計投入128億元用於抗震救災，今後還安排700億元，建立災後恢復重建基金(但這數字仍遠遠少於西方估計中共要動用400億美元即3千多億人民幣去辦08年奧運)。

在付出了非常慘重代價之後，人民必需從這次大災難中汲取血的經驗教訓，以幫助今後的防範。

大地震發生後，國內外的記者傳媒紛紛趕到災區，盡量如實地報道了實況，從而衝破了過去全由官方宣傳機構包辦發佈消息的傳統做法。從這些報道中，外界看到了許許多多感人的場面，可歌可泣的事蹟，比如醫護人員和搶救人員等在頭幾天內不眠不休地工作，他們到災區中冒險工作，不少人被傾下的泥石活埋；由於缺乏重型機械，要靠雙手發掘，有些救援人員更因過勞而犧牲了自己的生命。有些人腳或手被石壓著，在沒有麻醉藥時仍自斬或鋸斷手或腳，以便逃出生天。由於人力、物力、醫藥用品等各方面都大為不足，亟需外來的支援幫助，而國內外的捐款和物資幫助，也十分踴躍，表現出廣泛的同情。

中國政府的應對

要搶救出生存者，事發後72小時內是被視為「黃金時間」，搶救生命要爭分奪秒的。但中國政府在開頭66小時內，卻謝絕日本、台灣等外援人員；外交部在第2天才回覆歡迎捐獻資金和物資，卻謝絕人力支援。而「由於時間緊逼，在日本與台灣方面具有影響力的相關人士積極勸說下，中國政府在第4天接近中午才『同意』讓日本救助隊前來救援，時間已是災後近70小時。隨後也一一放行台灣以及其他國家的國際救援

隊和醫療隊。從12日傍晚福田首相提出願意派遣到15日中午前，整整66小時，中國政府在猶豫什麼？」(引自5月20日《明報》所刊的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訪問學者林泉忠文章)

地震是天然災害，人類至今還無法加以遏止它的發生，但已有可能預見它即將來臨，從而事先預警，使民眾知道，盡可能設法加以防備，減少損害。據大陸自由撰稿人易水虹先生在5月17日的《蘋果日報》論壇上刊文指出：33年前，中國成功地預報了遼寧海城7.3級地震，使成千上萬人的生命得以拯救。但32年前，由於中國國家地震局強硬壓下了對大地震的預報，才釀成了24萬人罹難，17萬人終生致殘的唐山大悲劇。當2008年4月中國地球物理學會下屬的「天災預測委員會」經集體討論，作出「在一年內(2008.5至2009.4)仍應注意蘭州以南，川、甘、青交界附近可能發生6至7級地震」預報之後，當準確預報過海城、唐山地震的耿慶國根據強磁暴組合，明確提出「阿壩地區7級以上地震的危險點在5月8日前後10天以內」之後，中國官方的地震系統仍然是以「此前監測未發現宏觀異常，也未捕捉到相關資訊」來加以排拒。特別是這次，四川省地震局5月9日在四川防震減災資訊網刊出《阿壩州防震減災局成功平息地震誤傳事件》一文，指當時村幹部「以訛傳訛」，把「地質災難」聽成了「地震災難」，因而勸村民搬到戶外居住。當局只去進行追查「謠言」的來源，而完全不理預警，也不作防災措施。但在幾日之後，大地震卻發生，造成了非常重大的災難死傷。這事說明了：如果當時中央和地方當局重視這些預警，採取措施，領導民眾加以防範，則地震的災難後果很可能不致如此嚴重，死傷人數可能會大減的。但這些預警卻被壓下了，「理由」是這恐怕會引起人心不安，影響社會穩定！

中國地震局和四川地震局事前沒有預測到地震的發生，也缺少預報的措施。據一位地震前剛好在四川完成地質調查的香港大學地球科學系教授陳龍生表示，中國在1976年唐山大地震後著重地震預報，曾動

員學生留意地下水變化，但改革開放後反而停止，地震預報工作較30、40年前退步。(詳見5月18日《明報》)

即使在大地震已經發生後，中國官方也較外國電訊遲遲才加以報道：在地震後12分鐘，路透社即率先引述美國地質調查所消息，指四川東部發生7.8級大地震，而中國官方新華社至2時56分，即在事發後28分鐘才發表這個消息。

血的經驗教訓

在規定建築物預防地震殺傷力方面，中國官方的標準也是偏低的。儘管過去在寧夏、甘肅、西藏都曾發生過8至8.5級大地震，其中，汶川在75年之內已3次經歷7級以上的地震，但官定的建築物防震限度只為7級。據說，每增加一級，便須增加許多成本。

這次四川大地震，有43萬多房屋被毀，其中學校有9千間，造成了6千多名學生和老師慘死。許多學生家長集體跪地哭訴，追問為甚麼校舍一震即塌，而附近的政府大樓等卻仍屹立不倒？他們歸咎於學校的豆腐渣工程，要求立即徹查。這就涉及有關官員貪污舞弊，承辦商中飽私囊，建築時偷工減料，即使是必需用的鋼筋，在倒塌後也露出是鐵線般幼，水泥也像沙一樣。

為要汲取這次的血淚教訓、防備今後天災再造成建築物輕易倒塌和大量傷亡損失，當局就必須立即全面徹查豆腐渣工程，追究有關人員的責任；同時要採取政策措施，觀測地震和及時提出預警(如果有的話)；人民更需全面監察賑災物資和捐款，以防有人發災難財。

這次大地震暴露出中國社會的貪污腐敗，其「總禍根」就在現存的官僚專制政治制度，因此，必須民主地徹底改革這個政治制度，以免天災與「人禍」今後聯同肆虐，加劇災難的惡果！

2008年5月28日



十月評論

October Review

第35卷第1期（總第224期）

2008年6月28日出版

出版/編輯/承印：《十月評論》編輯委員會

通訊處：香港郵政總局信箱10144 號

Address: GPO Box 10144, Hong Kong

E-mail: octoberreview@gmail.com

Website: <http://www.october-review.org>

〔本刊一切具名文章，不一定代表編輯部立場〕

「今年恐怕是中國經濟最困難的一年」 —— 析溫家寶的「直言」

張開

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日前在人大會議上作政府工作報告時，首先宣稱：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重大成就。

——經濟建設跨上新台階。國內生產總值達到24.66萬億元，比2002年增長65.5%，年均增長10.6%，從世界第六位上升到第四位；全國財政收入達到5.13萬億元，增長1.71倍；外匯儲備超過1.52萬億美元。

——全國糧食連續四年增產，2007年產量超過1萬億斤。

——國有企業、金融、財稅、外經貿體制和行政管理體制等改革邁出重大步伐。開放型經濟進入新階段。2007年進出口總額達到2.17萬億美元，從世界第六位上升到第三位。……

可是，在會議後召開的記者會上，他卻直言：「今年恐怕是中國經濟最困難的一年。中國經濟目前最大的困難是物價過快上漲和通貨膨脹的壓力，今年要把消費物價指數控制在4.8%左右並不容易，而且受美國次按危機影響，美元貶值、石油價格居高不下、世界股市大幅震盪，令溫總對世界經濟特別是美國經濟深感憂慮。」「難在什麼地方？難在國際、國內不可測的因素多，因而決策困難。」(1)

這是十分矛盾的：既然經濟上已有那麼重大的成就，卻反而出現了經濟上最大的困難。他說「決策困難」，就表現了執政黨的施政低能；如果指稱是物價過快上漲和通貨膨脹，那也是政策上有失誤，表明中共所倚賴的「宏觀調控」，大體上是失控和低效，是中共全面推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路線所造成的結果。市場經濟必然產生通貨膨脹和物價高漲，不受官方的宏觀調控政策所左右的。

通脹和物價飆升

具體就物價來看，國家統計局局長謝伏瞻1月24日公佈，內地去年全年CPI(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增幅為4.8%，創下自1997年至今11年的新高。而GDP(國內生

產總值)則連續五年保持雙位數增長，去年增幅達11.4%。不過，內地民眾質疑CPI報假數，同時抱怨GDP每年都在漲，幸福感在07年則整體下降。

謝伏瞻在記者會上表示，食品、居住價格上漲是拉動價格總水平上漲的主要原因，其中，食品價格上漲12.3%、居住價格上漲4.5%，70個大中城市的樓價則上升7.6%。

不過，官方公佈的數據，無論食品或房屋的價格加幅，與市民的實際感受相差太遠，因此受到質疑。

據《明報》記者報道：物價持續上升問題，在過去一年來一直是中國百姓最關心的問題之一。《明報》記者在兩會期間調查了解到：北京各社會階層中，由藍領到白領、由打工仔到老闆幾乎都對過去一年物價飛漲憂心忡忡。(2)

進入2008年，《文匯報》據《上海證券報》3月29日消息，國家統計局最新發佈的宏觀經濟景氣指數預警信號圖顯示，從去年9月至今年2月，宏觀經濟已連續六個月偏熱。居民消費價格指數、消費品零售總額、居民可支配收入等經濟指標則處於偏熱狀態，而財政收入更處於過熱狀態。據悉，1至2月份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上漲8.7%，創下自1996年以來的月度新高。(3)

國家統計局官員在2月19日稱，1月份食品價格急升18.2%，其中豬肉漲幅幾達五成九，是導致CPI大漲的主因；肉禽及製品，以及油脂價格漲幅均在三、四成；鮮菜價格上升13.7%，鮮果價格漲10.3%。(4)

北京經濟學家仲大軍在接受《蘋果日報》電話採訪時指出，統計局公佈的居民消費物價指數(CPI)數據不足以反映中國實況，實際上，這兩年中國普通民眾感受到的CPI，已經超過兩位數的水平，令人回想到上世紀八十年代末，「六四」風波前的情形，所不同的是，當年的通脹主要是國內原因所致，今天中國已成為世界經濟一部份，通脹原因更為複雜，結果也更難預測。

仲大軍指，國外熱錢大量流入是通脹的重要原

因，僅去年就多達約5,000億美元，「但中南海所依仗的所謂主流經濟學家們，抱殘守缺，對人民幣升值過於政治化，導致熱錢越滾越多，當局要不斷發行人民幣去應對，這樣情況，物價能不上漲？通脹能不加速？」(同上報)

《文匯報》在3月16日進一步報道：廣州市物價局3月14日發佈2月份廣州物價簡報，數據顯示食品類價格再度衝上新高，去年同期比漲23.2%，創下近13年來單月最高漲幅。而2月食品類價格環比上月上漲11.4%，肉禽及其製品價格環比上月上漲11%，去年同期比上漲41%。

同日的《文匯報》又報道：近一周以來，廣州市不少油站陸續出現柴油供應緊張的局面，部分油站甚至已「斷炊」多日。同時，湖北武漢市柴油供應緊張，導致該市58輛巴士被迫停駛。

面對著人民這種困難，政府工作報告許諾：在居民收入和消費方面，努力增加城鄉居民特別是低收入居民收入。調高最低工資標準；基本解決拖欠農民工工資問題；四次提高重點優撫對象的撫恤補助標準，統籌解決退役軍人實際困難。同時，重申要「防止價格總水平過快上漲，是今年宏觀調控的重大任務。」但「宏觀失控」或至少是很少效果，已是客觀存在的事實。在高通漲、高物價的時候，最受打擊的自然是廣大市民！官方許諾的增加居民收入，就算略為增加，無論如何也遠追不上通脹和物價的飆升速度。何況，中共還要更加推行市場經濟，則通脹和物價便會繼續飆升。

社會分化 貧富懸殊 鬥爭頻密

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副產物，就是社會向兩極分化，貧富日益懸殊。據2月中出版的《瞭望》周刊載文指出，中國的基尼系數高於所有發達國家和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正處於中國的歷史高點。中國居民收入差距已超過合理限度。根據世界銀行公布的數據顯示，中國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數(貧富差距程度)已由改革開放前的0.16上升到目前的0.47，不僅超過了國際上0.4的警戒線，也超過了世界所有發達國家的水平。若以城市最高收入組與農村最低收入組比較，更是高逾20倍。

一方面，私營經濟的蓬勃發展，更壯大了中上層

資產階級的勢力。

據統計，目前中國的這類新階層人士約有7,500萬，主要由非公有制經濟人士和自由擇業知識分子組成，作為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推動者，他們掌握或管理著10萬億左右的資本，他們的份量舉足輕重，對稅收的貢獻佔全國三分之一，預計到2010年，將達50%；進出口貿易總額的貢獻40%；出版發行的貢獻69%；有65%的國內發明專利和80%以上的新產品來自中小企業，其中95%以上是非公企業；就業方面，民營經濟吸納就業量佔90%以上。(5)

在今年的全國政協委員名單中，有超過60名新貴私營企業老總當選全國政協委員。他(她)們經濟實力日益強大，政治訴求也增加。例如對今年初實施的《勞動合同法》，其中有些人(如前女首富張茵，她的玖龍紙業集團是特別殘酷剝削工人的，從而建起她的首富地位。)便發言抨擊，要求修改對私企不利的條文。他們是中國市場經濟全面發展的主要獲益群體。

但另一方面，則是越來越多的人民貧困化。他們面對著日益飆升的通脹和物價，生活日益困難，被迫要節衣縮食，怨聲載道，不滿大增，有些人更怨憤得走到自殺。例如，《明報》記者報道：臨近農曆新年，內地通脹情況加劇，日前更首次發生疑因物價太貴而「逼死人」慘劇。廣州一名中年男子前日下午從越秀區一個高檔住宅區高樓跳下自殺身亡，跳樓前更大叫：「漲價太快，我受不了！」(6)由此可以想像：通脹和物價越是飆升，人民的怨憤將越會加劇！

關於人民對中國現狀(特別是對官方)怨憤的普遍化和激烈化，筆者在去年10月曾寫了《民怨民憤遍地浮現》一文，加以評述(刊於本刊上期，即總第223期)。後來據外電報道，中國近幾年來已引發了40萬宗社會衝突鬥爭，單在2007年，便引發了10萬宗，平均每天約引發274宗。

在物價日升，生活困苦的打擊下，中國工人為爭取改善待遇的鬥爭也日趨激烈，勞資糾紛的數量大增。僅據全國總工會屬下的企業調解委員會統計，2007年全國的勞資糾紛約高達40.6萬件，這還不包括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和司法系統的統計。全總的副主席張鳴起透露，近年的勞資糾紛案數量急劇上升，每年增長速

度超過20%。(7) 由此可以反映中國社會不安的加劇，政局的更加動盪。

中國廣大人民除了奮起進行鬥爭，以對抗社會不公，爭取本身權益之外，有一部份人還要利用法律手段，寄望於法庭能公平解決爭議，於是多年來爆發了不斷的上訪潮，逐級投訴，直至上京告狀。但即使抵達北京，也很少人得償所願，而且多遭原地當局派人從北京帶回家鄉。不過，形勢已在逐漸變化。據3月1日《明報》報道：兩會舉行前夕，內地數萬訪民(上訪民眾)通過維權網站聯署「還訪民權利與尊嚴」公開信，向全國人大代表和全國政協委員陳情，呼籲「還訪民權利與尊嚴」，要求依法批准訪民成立「互助自救會」，准許創辦陳述冤情的網站、報紙與刊物，並要求廢除勞教制度，釋放被無辜關押的上訪者及中止打壓上訪行動。公開信表示：目前上訪民眾人數已逾千萬，而最近「維權網」公布的一份民間調查報告——《血淚上訪路——上訪調查報告》，詳細列舉了有關迫害上訪群體的情況，其中有約四成的上訪者遭到拘留勞教與毆打，而3%曾被關進精神病院。

這項發展顯示出，上訪民眾已從個別行動，孤立無助，逐漸走向團結互助，共同聯合鬥爭——縱然這還是個好的開始，仍未全面化和顯著奏效。

當局的對策

中國政府在申辦08年奧運時，曾許諾改善人權狀況。但在最近仍無理地重判維權人士胡佳3年半徒刑，僅僅是因為他發表了評論文章，便再遭文字獄之災。據《明報》列舉的又有：07年10月初杭州異議作家呂耿松被捕、北京拆遷維權人士葉明君被拘留、維權律師李和平遭毆打、維權人士楊春林因幫東北失地農民，組織上萬人在「要人權，不要奧運」的公開信上簽名而被捕，維權律師騰彪3月初遭秘密扣押兩天後才獲釋。(8)

中國監獄囚禁著大量的政治異議人士，其中因六四事件而被囚禁至今的便仍會有約一百人。據3月30日《明報》報道：1989年任香港美商會主席的康原(John Kamm)，1990年起透過他在內地經商建立的人脈關係，開始從不同途徑蒐集六四事件中被扣押人士名單，並展開漫長對話之旅，19年來曾接觸數以百計民

運人士。他估計，目前仍有60至100人因六四事件被關押在牢獄。

鑒於官方各方面的施政和政策已日益加劇人民的痛苦、不滿，造成日增的反對、抗爭，又為了緩解今年中國經濟的「最困難局面」，中國政府於4月1日公佈《國務院2008年工作要點》，從10個方面部署今年國務院的主要工作。北京的政情分析家指出，《要點》用了很大篇幅，強調抑制通貨膨脹是今年國務院工作的重中之重。其中既承認了中國已進入全面通脹時代的事實，又給出了嚴控糧食出口等抑制通脹、避免通脹引發激烈社會衝突的具體辦法。

《要點》雖然強調要抑制通貨膨脹，著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但同時卻要「深化經濟體制改革」，這種改革又必然要加劇通貨膨脹和物價高漲。而它的改善民生的辦法，則主要是「更加注重社會建設」；以及要「依法打擊串通漲價，囤積居奇，哄抬物價等違法違規行為」，但這些行政手段是不足以阻止市場經濟漲價的規律運行的。

對於國內著名學者指明是造成民眾疾苦「總病根」的中共官僚獨裁政治體制，溫家寶在記者會上，雖然再次承諾推行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改革，表示為了國家的富強和社會的公平正義，「我願獻出我的全部心血和精力」；不過，他未回答記者追問的如何深化政治體制改革，只強調解放思想和改革開放將永不停止。這樣的迴避闡釋具體改革辦法，正正表明中共不會進行徹底的政制民主改革，不會把官僚獨裁政治體制改革成社會主義民主政制。唯有依靠廣大民眾的譁起鬥爭，才能達成這種改變！

2008年4月4日

註釋：

- (1) 3月18日《文匯報》
- (2) 3月12日《明報》
- (3) 3月30日《文匯報》
- (4) 2月20日《蘋果日報》
- (5) 3月9日《文匯報》
- (6) 1月23日《明報》
- (7) 3月15日《明報》
- (8) 3月19日《明報》

西藏等地騷亂及其解決之道

軍行

抗爭連綿不絕

最近，西藏等地又爆發了遊行、示威抗議騷亂。3月10日，拉薩色拉寺十多名青年僧人和平示威，被當局「採取措施」後，大昭寺僧人當晚進行絕食；11日，色拉寺大批僧人在寺門靜坐，抗議當局戒嚴；12日，各寺全部戒嚴；尼姑下山遊行，被軍警攔截，部份尼姑被「採取措施」，哲蚌寺有兩僧人割腕……。

3月14日，小昭寺僧人推翻了封鎖寺門的警車，寺外圍觀的藏人和僧侶開始同武警公安衝突。打砸和縱火的暴力行為迅速瀰漫，拉薩多處起火，入夜，全城槍聲此起彼伏……。(以上引自《蘋果日報》4月10日刊登的孔捷生雜文《西藏人的眼睛》一文中的藏胞目擊記)

3月14日的遊行示威，是1989年以來最大規模的，除拉薩外，更擴大到藏區各地，西藏、青海、甘肅和四川等地有許多藏人和僧侶也上街響應。甘肅卓尼縣一所藏族中學，有幾百名高中生罷課示威，聲援西藏人民。

在拉薩騷亂發生後，中國政府立即進行封城，開進大量軍警，大規模搜捕參與示威的僧侶和藏人。軍警開槍鎮壓，據官方新華社指，騷亂中造成10名平民死亡，而西藏流亡政府則指至少有30人死亡。

這種武力鎮壓，即使把騷亂平服下去，恢復表面上的穩定，但卻會加深藏漢兩民族之間的矛盾，加劇藏人對漢族統治者的惡感、憎恨，將來一有機會，便會再度爆發，而這次則很快便得到證明。

在3月14日示威被武力鎮壓之後兩星期，即3月29日，拉薩的大小昭寺地區又發生數千人的示威活動；4月3日，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也有示威，又遭到軍警的武力鎮壓，有8藏人被槍殺。

自從解放軍早年大舉開進西藏以後，西藏即發生示威抗議甚至暴動，這些包括：1959年，西藏人觸發了武裝叛亂，被中共戡平了；1987年10月1日，拉薩爆發了暴動，在這之前5天，已發生過街頭騷動，10月6日再出現一次示威遊行；1988年3月5日，拉薩的2千人暴

亂，使公安、武警等300多人受傷，1人死亡，民眾方面更有多人死亡……。 (關於87、88年的事件，張開曾分別撰文於本刊總第130-131和140期評述過。)此後，藏人和僧侶的抗爭便難以停息，其根本原因是大漢族官僚的壓迫依然存在，有時甚至變本加厲。

除藏族人民和僧侶的抗爭外，新疆的維吾爾族也時有爆發抗爭行動，雖然消息外洩的事例近來似乎不多，但他們的行動實際上並沒有停止，有的更為激烈。例如，在今年3月7日，一名維吾爾族少女暗帶汽油由烏魯木齊登上赴京的飛機，企圖中途製造空難，點著汽油炸毀飛機，自己也同歸於盡；但圖謀被服務員發覺，制服了她，由此可反映出事態的嚴重。在同月23日，據報導，新疆南部和田市也有近千人示威，要求停止對被捕的維吾爾族民眾施加酷刑，並釋放政治犯；有600名示威者被捕，副州長承認民警開槍鎮壓，「依法使用了武器」。

從這項報導可反映出，新疆境內少數民族所受壓迫是嚴重的！人民被無理拘捕遭受酷刑，粗暴地違反了《世界人權宣言》第5章第9條「任何人不容加以酷刑」等規定。

中國是多民族的國家，在全國解放後，從境內的少數民族人民看來，本族人受大漢族官僚統治著，民族之間一直存在著壓迫與被壓迫的民族矛盾，本民族縱使給予有自治之名，根本上並無自治之實，在宗教自由方面也是虛有其名的。以西藏存有的寺院的清理為例，「根據班禪喇嘛在文革爆發前4年向中央委員會遞交的《七萬言意見書》：『民改前的西藏有大、中、小寺廟2500餘座，而民改後由政府留下來的僅只有70多座，減少了97%多，由於大部分寺廟沒人居住，所以大經堂等神殿僧舍無人管，人為的和非人為的損害，破壞巨大，淪於已倒塌和正在倒塌的境地』。到了文革那十年，僧人被迫還俗，佛寺遭到洗劫的慘況就更是變本加厲了。有些論者承認這種種做為對西藏造成的災害確實很巨大。」(引自梁文道的《期待真正的多民族國家》一文，刊於今年4月4日《明報》)

至於北京派去統治西藏的張慶黎辱罵達賴喇嘛是「披著袈裟的豺狼，人面獸心的惡魔」，這對於向來信奉達賴為「活佛」和精神領袖的西藏人，將會視為極大的污辱，因而更會是非常反感的。這些都會加強他們對於派到西藏胡作胡為的官僚的憎恨，以及對官僚統治的離心傾向，從而更急於渴求獨立。

據孔捷生指稱，毛澤東當年曾對西藏代表說：「等到西藏繁榮以後，我們把漢族幹部都撤回來，西藏還是你們的。」毛又對派到少數民族地區的幹部說：「你們要抱著贖罪的態度去工作，因為從歷史上看，還是漢族對少數民族的欺壓多些。」周恩來在簽署《十七條協議》時對阿沛阿旺晉美說：「藏族統一很正當。」59年陳毅在拉薩說：把所有藏族地區合併到西藏自治區，有助於西藏發展。（引自4月21日《蘋果日報》載孔捷生的文章），這些話雖然還不是要給西藏民族自決權，但比之今天的「憤青」（陶傑撰文刊報稱之為「糞青」）高舉「西藏是中國的」旗幟遊行，比之今天的「藏督」張慶黎對達賴喇嘛的肆意辱罵，是大大不同的。

民族自決權的重要性

據4月20日倫敦BBC廣播指出：學者王力恒（譯音）著書稱，西藏在1950年前一段長時期是獨立的。1950年，500萬解放軍開入，人數多過藏人，從此統治著西藏。

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前副教授焦國標著文（題為《讓我來給中南海上堂西藏課》）評說：「北京說藏人鬧事是想獨立，彷彿大逆不道。錯！當然是想獨立，……想當年，滿族統治你漢族時，你不也想『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嗎？……『黃鱔再小，也想成鯨。』藏人再少，也想獨立。你必須承認藏人有想獨立的權利。想獨立是人之常情！想獨立無罪！……」（見4月4日《蘋果日報》論壇所載的該文）

中國共產黨人過去一直自認是信奉馬克思—列寧的學說主張的，俄國也是多民族的國家，全國約有130個民族，其中人口超過百萬的民族有23個。因此，有必要介紹列寧對於俄國境內少數民族的政策主張，以作為今天中國的借鑒。

列寧所領導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黨綱第9條是承認民族自決權的。他在1914年寫的《論民族自決權》

的長文中指出：「所謂民族自決，就是民族脫離異族集體的國家分離，就是成立獨立的民族國家。」無產階級「承認各民族平等，承認各民族都有成立民族國家的平等權利。」「承認民族平等是不是包括承認分離權？如果包括，那就是說，羅莎·盧森堡承認我們黨綱第9條在原則上是正確的。」「如果我們不提出和不宜傳分離權的口號，那就不僅是幫助了壓迫民族的資產階級，而且是幫助了壓迫民族的封建和專制制度。」（引自《列寧選集》4卷集第2卷第509，523和526頁）

列寧在《社會主義革命和民族自決權》（提綱）中又一次闡述：「民族自決權從政治意義上來講，只是一種獨立權，即在政治上同壓迫民族自由分離的權利。具體說來，這種政治民主要求，就是有完全的自由來鼓動分離。鼓動實行分離的民族通過全民投票來解決分離問題。因此，這種要求並不等於分離、分散、成立小國家的要求，它只是反對一切民族壓迫的徹底表現。一個國家的民主制度同分離的完全自由越接近，在實際上要求分離的願望也就越少越弱，因為無論從經濟發展或群眾利益來看，大國家的好處是不容置疑的，……承認自決並不等於承認聯邦制這個原則。可以堅決反對這個原則而擁護民主集中制，但是，與其存在民族不平等，不如建立聯邦制，作為實行完全的民主集中制的唯一道路。主張集中制的馬克思正是從這種觀點出發的，他甚至寧願愛爾蘭和英國結成聯邦，而不願愛爾蘭受英國人的暴力支配。」（同上書第719頁）

「正是從德國工人革命運動的利益出發，馬克思在1848年要求德國民主派一勝利就宣布和實現受德國人壓迫的各民族的自由。」（同上書第722頁）

列寧領導十月革命勝利後，新成立的國名定為「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簡稱蘇聯），由15個加盟的蘇維埃共和國組成，她們本身各自是蘇維埃共和國，既可以加盟，也可以分離，完全由她們各自決定。這就是列寧落實黨綱中關於境內「少數民族有自決權」政策的具體表現。

由此又可說明：中共在中國實行的一黨官僚專政，與馬克思—列寧主義（包括對國境內少數民族自決權的主張），是毫無共通之點，而且是完全背離的！

實際上，民族自決權這個主張，並不只是列寧及其政黨才獨有的，而且是舉世的共識。在中國，上海辭書出版社1979年版的《辭海》第1806頁中，就有如下的解說：「民族自決權 各民族自己決定自己命運的權利，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解決民族問題的一個原則。無產階級反對民族壓迫，堅持民族平等，主張各民族可以自由分離與自由聯合。無產階級政黨承認民族自決直至各民族有自由分離的權利，這是反對民族壓迫的徹底表現，目的在於消滅民族壓迫，消除歷史上造成的民族隔閡和互不信任，使各民族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聯合起來，求得民族解放；同時在打破帝國主義壓迫和束縛之後，各民族可以在真正民主的基礎上，根據自願原則實行平等的聯合。」

而尤其重要的是，《聯合國人權公約》(1966年12月9日在紐約開放簽字)內的第壹編第一條即明確地規定：

「一、 所有民族均享有自決權，根據此種權利，自由決定其政治地位及自由從事其經濟、社會與文化之發展。

「二、 所有民族得為本身之目的，自由處置其天然財富及資源，但不得妨害因基於互惠原則之國際經濟合作及因國際法而生之任何義務。無論在何種情形下，民族之生計，不容剝奪。

「三、 本盟約締約國，包括負責管理非自治及托管領土之國家在內，均應遵照聯合國憲章規定，促進自決權之實現，並尊重此種權利。」(見王德祿、蔣世和編而由中國圖書刊行社出版的《人權宣言》第25頁)

中共所領導的中國也在這項《公約》上簽了字，成為締約國之一，但至今許多年仍不開動人大這部御用機器蓋上個橡皮圖章，顯示了中共的敷衍和不負責任。

但在民間，並非清一色地都是狹隘的大漢族主義者，像那些反西藏達賴的「憤青」那樣（這群憤青們的行徑在某種程度上類似於文革時期的紅衛兵），還有許多人是能夠理智地獨立地觀察和思考，從而支持人權宣言中的原則立場，不贊同大漢族對境內少數民族的壓迫，以至於同情西藏等地的少數民族應有自決權

的。例如香港大學哲學系學生陳巧文便顯現出對藏族的同情，自製出雪山獅子旗，加以展示飄揚，參加五二遊行，以顯示她不滿中國政府在簽辦08年奧運時承諾改善人權却不加以兌現；另一位留學美國杜克大學的中國女學生王千源，發出了獨立的聲音，認為漢藏人民同是中國人，應該理性地對話；她們都立即遭到海內外憤青的野蠻攻擊，被扣上「漢奸」、「賣國賊」的帽子；又例如，《南方都市報周刊》副總編輯長平，最近在《金融時報》中文網刊出《西藏：真相與民族主義情緒》一文，亦被攻擊為「反華勢力的國內代表人」……。這都是莫須有的羅織罪名，絕不容許有不同的意見存在，表現攻擊者不過是官僚獨裁制度的幫兇而已。

2008年5月1日



今次騷亂軍警成為襲擊對象，一輛運兵卡車，車頭玻璃被砸破。（路透社）



拉薩街頭站滿示威者，街上雜物焚燒，火光熊熊。（美聯社）

中共對托洛茨基和陳獨秀評價的轉變

張開

中國共產黨在幾十年間,尤其是在全國掌權以後,曾製造出無數的冤假錯案(包括許多的文字獄,和對不同政見者的迫害),在日益強大的洶湧群情壓力下,它終於被迫在1978年宣稱要「實事求是」,「有錯必糾」,要平反冤假錯案。

雖然這項宣佈姍姍來遲,而且言非必行,即使有行動也是有選擇性、局限性的;但這卻逐漸激起了民間的特別是史學界的迴響,紛紛撰文探討中國歷史上的冤假錯案。

其中有一位學者曾憲新先生,以《中國托派不是漢奸》為題的文章,刊登在北京的《百年潮》2005年第二期的《史事辨證》一欄上。本刊於同年第2/3期合刊中,刊出了《史學界平反「中國托派是漢奸」錯案》一文,介紹了曾先生這篇文章。該文證實:「經歷多方的查證研究,眾多黨史研究工作者對此(指「中國托派是漢奸」一引者)持否定態度。」

中共對托洛茨基評價的轉變

在中共對托洛茨基的評價方面,也從完全否定逐漸轉變到正面肯定其歷史地位。馬長虹先生寫的《中共對托洛茨基評價的轉變》一文(刊於《炎黃春秋》2006年第7期)便對此作了具體的敘述。本文以下的所有關於「轉變」的敘述,俱引自馬先生這篇文章。

文章首先指出:「自上世紀20年代末以來的近80年時間裡,在整整幾代人心目中,托洛茨基或『托派』都是反動或反革命的代名詞。這並不奇怪,因為早在中共1929年10月的《中央關於反對黨內機會主義與托洛茨基主義反對派的決議》中,就有托洛茨基反對派『積極地在政治上,組織上,各方面來攻擊黨,破壞黨』的定性,在毛澤東的著名文章《論持久戰》中,甚至有『漢奸托派』這樣的字眼。」

中共對托洛茨基的評價,隨著國內外形勢的變化和黨史、共運史研究的深入,幾十年來有著一個巨大的轉變過程。這些轉變集中體現在毛澤東著作及一些官方的權威黨史著作中。

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毛澤東選集》第一卷《論

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一文中,針對托洛茨基的注釋是這樣寫的:『托洛茨基集團,原是俄國工人運動中的一個反對列寧主義的派別,後來墮落成爲完全反革命的匪幫。現時的托洛茨基主義,並不是工人階級中的政治派別,而是一夥無原則的和無思想的暗害者、破壞者、偵探間諜、殺人兇手的匪幫,是受外國偵探機關僱用而活動的工人階級死敵的匪幫。』。注釋絕口不提托洛茨基在蘇聯革命和建設中的巨大功勳。

1989年以後,國內國際形勢發生了巨大變化,中共對托洛茨基的評價也逐步地發生了微妙的較客觀的轉變,這種轉變體現在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上引該文)關於托洛茨基的注釋,修改爲如下內容中:『托洛茨基(1879-1940),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後曾任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等職。列寧逝世後,反對列寧關於在蘇聯建設社會主義的理論和路線,一九二七年十一月被清除出黨。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托洛茨基進行了許多分裂和破壞活動。』

從注釋內容的整體來看,對托洛茨基的評價依然是負面的。但是,這裏有兩個改變:一、注釋中加入了一句很重要的話,『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後曾任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等職。』二、刪去了原注釋中大量醜化和誣蔑性詞彙。

更大的改變接踵而至,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毛澤東文集》第一卷《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一文中,對托洛茨基的注釋又有所不同:『托洛茨基(1879-1940),曾任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爾什維克)中央政治局委員、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等職。列寧逝世後,他反對列寧關於在蘇聯建設社會主義的理論和路線,在聯共(布)黨內組織反對派,進行派別活動,一九二七年十一月被開除出黨。』

注釋中又有了三個可喜的變化:一、肯定了托洛茨基在布爾什維克黨內的領導工作;二、頗帶蔑視色彩的『清除』出黨,改爲了較中性的『開除』出黨,體現了中共對托洛茨基態度的溫和傾向;三、肯定了托洛茨基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歷史功績,刪去了原來『在國際

共產主義運動中……進行了許多分裂和破壞活動』的不實之詞。僅就托洛茨基對中國革命的觀點而言,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年新版《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中,就有這樣的表述:『托洛茨基對大革命後期蔣介石、汪精衛兩個集團的階級實質的認識,對他們將要叛變革命的判斷,對斯大林在指導中國革命中的錯誤的批評,有些是正確的或基本正確的』,『托洛茨基認為斯大林應對中國大革命的失敗負責。』

但是,注釋中『列寧逝世後,他反對列寧關於在蘇聯建設社會主義的理論和路線』這句評價並沒有改變,這是致命的。

就在20世紀即將結束的時候,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毛澤東文集》第六卷《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的講話》一文中,第七卷《在莫斯科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上的講話》一文中,均有對托洛茨基的注釋,對其評價終於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托洛茨基(1879-1940),十月革命時,任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爾什維克)中央政治局委員、彼得格勒蘇維埃主席。十月革命後,曾任外交人民委員、陸海軍人民委員、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委員等職。一九二六年十月聯共(布)中央全會決定,撤銷他的中央政治局委員職務。一九二七年一月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決定,撤銷他的執行委員職務,同年十一月被開除出黨。一九二九年一月被驅逐出蘇聯。一九四〇年八月在墨西哥遭暗殺。』

首先,也是最最重要的,這裡刪去了舊注釋中『反對列寧關於在蘇聯建設社會主義的理論和路線』的評價,這等於說『反對列寧』是非真,如果是真實的,就不必刪去,正因為是非真,所以應刪去;事實上,托洛茨基非但沒有反對列寧,反而在一系列大是大非面前是列寧最可信賴的戰友,這從『列寧全集』中收錄的大量有關托洛茨基的文章和信件中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其次,刪去了原注中『在聯共(布)黨內組織反對派,進行派別活動』的評價,肯定了托洛茨基一直顧全黨的團結的大局,致力於黨內民主建設的功績。托洛茨基始終認為自己是布爾什維克的一員,他與斯大林的鬥爭是黨內鬥爭;他從不籠統地否定多數派的政策,而是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指出對方的錯誤,闡明自己的觀點,

還為對方指出糾正錯誤的方法和正確途徑,預見對方的錯誤將導致的後果。他對多數派的批評都是一種建設性的批評。這與多數派一味謾罵、固執己見的作風大相徑庭。

第三,新注釋中對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之前及之後各個領域中的工作給予了充分肯定,逐一點出了他所擔任的重要職務。

第四,使用了『遭暗殺』字樣,體現了中共對托洛茨基之死的同情,否則的話,完全可以使用『被處決』。

至此,中共終於對托洛茨基有了一個較為客觀公正的評價。但是,想要扭轉幾十年來根植於人們頭腦中被歪曲的觀念恐怕比修改毛澤東著作中的注釋更艱難。這需要史學工作者本著『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原則,不斷與時俱進,有所創新,讓歷史中不再有『被遺忘的人物和空白點』。這是當代史學工作者的義務,更是偉大的中國共產黨的責任。」

以上的敘述和闡釋的意見,充份體現出作者馬先生努力鑽研歷史的認真、客觀態度和難能可貴成果;儘管我們不認為中國共產黨是真正「偉大的」,有如馬先生大作中最後一句對它所加上的讚美形容詞那樣。

古語有云:「解鈴還須繫鈴人」!過去對托洛茨基所加上的污蔑不實罪名,既然是由中共中央文件和中共最高領導人所作出的,則改正時也必須由中共正式文件宣佈,而不應只在一些文章的注釋中不動聲色地不斷作出修改更正,像上引的改動注釋那樣,儘管一次次的更改大體上表現出比以前的評價有所進步、務實。

對陳獨秀的平反

近幾年來,中國民間和學術界已掀起了平反陳獨秀的熱潮,對陳獨秀的好評如潮湧現。不久之前,中共的刊物《上海黨史與黨建》在2008年1月號上,也刊登了一篇「專稿」,《從黨的五大到八七會議》(副標題為《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第一次轉折》),此文據介紹是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2007年12月1日在由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國家文物局和中共湖北省委在武漢召開的「從黨的五大到八七會議學術研討會」上所作的學術報告。

石先生認為:寫黨在大革命後期犯的錯誤,不要都算在陳獨秀一個人的賬上,讓他一個人負責;他犯錯誤

的主要來源,一是共產國際來的,二是我們黨本身的。縱觀陳獨秀一生,功大於過,他的主要功績至少有這樣五點:

一是新文化運動的『總司令』,是高舉民主與科學兩面大旗的偉大旗手,他開啓了中國20世紀思想解放運動的先河。他提出的民主與科學兩大任務,迄今還是我們黨繼續努力的奮鬥目標。

二是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立者。不是說黨的創立是『開天闢地』嗎?如果是這樣,陳獨秀就是『開天闢地』第一人和首要功臣。

三是中國共產黨五屆中央的主要領導人。他是領導中國共產黨屆數最多的。前後五屆,可能空前絕後。他領導我們黨從一個只有50多人的小組織變成了擁有近6萬人的大政黨,從那時起具有了廣泛的群眾基礎,僅此就功不可沒。

四是對中國歷史和社會的基本國情,用馬克思主義觀點進行初步研究,提出了怎樣進行中國革命若干有價值的重要理論觀點。

五是從投入五四新文化運動開始直至抗戰時去世,既坐過北洋軍閥的班房,也坐過國民黨反動派的大牢,兩個兒子都獻身於中國革命事業,對反動勢力一直進行不屈不撓的鬥爭,有高昂的民族氣節。這也是難能可貴的。

陳獨秀的錯誤主要是兩條。一條是前面講的大革命後期的嚴重右傾錯誤,但這是黨內路線是非問題,不是革命與不革命問題。另一條是參與托陳取消派。對於後一條的是非,目前也基本清楚了。第一,這主要涉及當年聯共(布)的黨內鬥爭,對於當年聯共(布)的黨內鬥爭,人家都不拘泥於幾十年前的『老皇歷』了,我們爲甚麼不能與時俱進,重新審視這段歷史呢!?第二,陳獨秀參與托陳取消派,屬於對中國革命的指導思想和意識形態的紛爭,盡管其看法有嚴重錯誤,但更多地屬於理論論爭,也不能因有這方面的錯誤而繼續『定罪』。第三,陳獨秀參與托陳取消派,盡管具有分裂黨的性質,但並沒有做危害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事情,沒有裡通外國的勾當。第四,對陳獨秀的分裂行爲應與張國燾的分裂行徑加以區別,兩者的性質和情節是不一樣的。張國燾是明目張膽地成立『第二中央』,自封主席,擁立爲

『王』。『托陳取消派』是一種不贊同中共中央的路線和政策的派別活動,並沒有搞兩個『中央』。再則,張國燾在抗戰開始後就跑到蔣介石那裡去了,拿國民黨的津貼做事,而陳獨秀拒領國民黨的津貼,即使窮困潦倒,始終不爲國民黨的金錢所誘惑。這點硬骨頭精神很不簡單,因此不能與張國燾等而視之。

基於對陳獨秀的上述功過分析,石先生以爲是功大於過,可以「三七開」!(即是說:七分功,三分過——引者)。

最後,他認爲,「現在到了全面評價陳獨秀功過的時候。2009年是陳獨秀誕辰130周年,我們黨史界從現在起就應當著手準備,爲推進給陳獨秀平反,恢復黨籍和召開紀念學術研討會等活動做點工作。」

以上轉引的石先生這篇「專稿」,儘管是刊登在中共的重要刊物上,作出「擺事實,講道理」的論述,但仍然不能算是代表中共的正式態度。多年以來,中共最高領導人宣稱以民爲本,執政爲民,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平反冤假錯案,有錯必糾……;但人民一方面在聽其言,觀其行;另一方面則要迫使他們言出必行,兌現其許諾,而絕不能空口說大話,讓人民只在望梅止渴,畫餅充飢。

譬如以中國托派所遭受對待來說,中共長期來污蔑托派爲「漢奸」、「帝國主義走狗」;在中共掌握全國政權後的1952年12月22日,在全國拘禁了中國所有的托派份子甚至其家人及同情者,其中有部份人更被無辜地剝奪去自由達二、三十年之久,罪名只是莫須有的「反革命」!對於托派這些冤假錯案,一手泡製的中共領導層必須立即加以平反,翻案,完全恢復他們的聲譽。只有這樣做,中共領導人才有可能是對此較爲負責任的!

從托洛茨基、陳獨秀以至中國托派之逐漸得到史學界甚至官方出版物的翻案、平反,可以又一次證明:歷史是最公道的,被歪曲的事實終有真相大白的一天到來,任何污蔑誣捏都不能永遠得逞而不被揭穿改正。現時的這種重新評價(亦即是翻案、平反),不但只是對托洛茨基和陳獨秀兩人,也應該是對他倆的同志和托派的間接翻案、平反,只不過不願公開而正式地連帶說出吧了。歷史自有公論,公道自在人心,加上人民的努力和爭取,則完全水落石出的時候終將會到來的。

2008年4月12日

悼念老戰士李永爵同志(1921-2008)

十月評論社同人

李永爵同志又名李洛明，筆名李平，1921 年出生於廣東省增城縣一個老華僑的家庭。1938 年春到香港求學，加入托派的外圍組織中青學會的讀書會，後來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思想，決意要為追求實現共產主義社會而奮鬥。從此時起，他一直為了這個崇高理想，受盡了無數地下革命者難以避免的被壓迫打擊，但他矢志不移，直至走完他人生的最後歷程，非常不幸於本月二日病逝，終年 87 歲。

1941 年夏李同志到上海升讀大學，得以接受托派中央領導人的講課培教，是年 12 月，他們所居住和工作的上海租界，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為日帝所佔領。他和一位劉同志接受組織委託，負責保管各同志的書籍文件，油印出版刊物及內部文件。

1944 年初，因工廠同志罷工而受牽連，他和劉同志亦被日帝憲兵會同汪偽政權拘捕，在憲兵監督下嚴刑迫供，灌水、毒打、通電灼痛、拷問煎熬通宵達旦，但他們都堅拒供出任何內情，經受得起嚴峻的考驗。

1948 年，國民黨政權在 3 年內戰中兵敗如山倒，全國臨近解放，便到處亂找人。李同志當時在上海開辦民校，只因家裡有幾本合法出版的《求真》和《青年與婦女》，即被視為共產黨的證物而被捕，後來在他妻子的奔走營救下，於 49 年 3 月出獄，回到廣州工作。

1952 年 12 月 21 日晚上，他同妻子又被中央軍委會逮捕，扣上「反革命」的莫須有罪名，判刑 15 年，強迫勞動改造。刑滿後仍不獲回家，繼續留廠做工，接受「專政」，再過了 21 年的留廠「就業」。

1983 年 9 月，他才被批准回上海。那時已 63 歲，大好的青壯年時期和健康，被三個不同時代的統治者所摧殘，只因他堅持共產主義的理想和事業，不向統治者屈服求榮。他的妻子羅麗萍也同他一樣「三進三出」不同統治者的牢獄，在 1988 年 11 月 11 日先他而病逝。

李同志晚年身患多種病痛，尤其是前列腺癌，竟最後奪去他的生命。他的一生，是革命者戰鬥的一生，也是飽受統治者折磨、坎坷的一生。他在返家後寫下了他這些苦難的經歷，也記下他對許多戰友的回憶，在他永別這個不合理世界之前半年，終於匯集成書出版，取名為《坎坷》，這個書名



很恰切地反映出他的一生，同時也是對所有壓迫他的統治階級或階層的強烈控訴！他還有一本遺集將會由友好人士出版，這些都是他在晚年寫下來留給後世，作為他的一點貢獻，期望能夠提供個人的真實資料，給大眾認識統治者面貌參考。

2008 年 1 月 4 日

悼 李永爵

浪戈

牛棚半世實何求	汪蔣毛獄輾轉囚*
保家衛國匹夫責	拯救農工壯士謀
西流南針存芳譜**	東風北熊驚夢留
喜看狂魔相繼往	我續高歌為自由

* 永爵在日治時汪精衛政權、和平後蔣介石政權和毛澤東年代監獄，前後失去自由 30 多年

** 二次大戰期間，永弟與陸續在香港成立宣傳抗日救國的《西流劇社》、《南針》是他們戰後在香港出版的工人刊物

羅麗萍三進三出牢獄

李永爵

[編者按：此文是李永爵同志懷念他的亡妻羅麗萍，在他生時寫下的。這樣的「三進三出牢獄」，其實也是他倆的共同遭遇。在悼念李同志逝世之時，特刊出此文以表達本刊同人對羅麗萍同志一生遭遇的同情與懷念。]

羅麗萍從小在綢廠做工，性格堅強，對人真誠，參加中國共產主義同盟（托派）後，決心為工人階級的解放事業而奮鬥。她一生三次坐牢，苦難深重，第一次在敵偽時期，第二次在國民黨時期，第三次在解放後，她有一段傳奇式的坎坷史。

1944年上海淪陷期間，她所在的滬西一綢廠，由於廠裡無理開除工人，激起大家公憤，罷起工來，老闆報告了敵偽巡捕房，於是羅和魏秋等幾個工人代表被抓了去，嚴刑逼供，要她們承認是共產黨，但她們絲毫不怕威嚇，堅持說工廠無理開除工人，大家生活無保障，只好去跟老闆說理而已，巡捕房盤問不出什麼來。幾個工人代表被抓後，工人們憤怒不已，有個新工友自告奮勇，每天送飯到捕房去給他們吃。她名叫楊玉瓊，廣東人，戴著一付眼鏡，知識份子模樣，因而引起了巡捕房密探的注意，懷疑她就是共產黨，來煽動罷工的，敵偽便把她抓了起來。原來這位楊玉瓊是個歸國華僑，愛好體育運動，曾是廣東省女籃隊員，參加過全國運動會，後來她參加托派組織後，來到上海學習，響應托派“到工人中去”的號召，才進綢廠做工不久，就發生了這次罷工，她非常激動，熱情為被捕工友送飯，萬萬沒有想到自己也會被逮捕！她從未經受過考驗，被捕後一經嚴刑拷打，便神經失常，竟然供出了托派中央劉耀如家裡的地址來。

當大家知道綢廠出事，楊玉瓊被捕後，組織認為她未經考驗，要注意防範，她所知道的人都要及時撤離！果然不出所料，敵偽派出軍警去抓劉耀如，可幸劉已及時撤離了，敵偽沒法，瘋狂搜捕，只抓到租房的擔保人高擎宇，和住在同屋亭子間的兩個20出頭的青年人：劉康和李堅，把他們抓到福州路上海警察總

局，由敵偽的“特高科”作破獲共黨大案審理！

高擎宇是個托派，他商人模樣，能說會道，只說給同鄉老劉租屋蓋過保，其他的事一概不知，敵偽在他身上怎樣也問不出所以然來；兩個青年也是托派，雖被嚴刑毒打，灌水迫供，打得鼻青眼腫，死去活來，但怎樣也追問不出劉耀如的下落。這三位不幸被捕的同志，堅持鬥爭，再也沒有牽連到其他人。敵偽後來明知他們並非共產黨，但對托派也毫不放過，雖然一無所獲，只好先把巡捕房關押的幾個工人代表放了。之後，敵偽毫無辦法，只好把這四個人人都交保釋放了。

值得一記的還有一段險情：得知楊被捕後，大家紛紛疏散，中國托派領導人彭述之躲到高擎宇所在的商行的宿舍裡，那天晚上突然聽到樓下激烈的敲門聲，他立即驚醒，連忙穿上衣服摺好被子，迅速爬到天臺上，並從本樓爬到隔壁又隔壁的天台去！因而躲過了一場浩劫，否則被日本帝國主義者抓去，就不堪設想了！後來在彭的夫人陳碧蘭的《我的回憶》中，也有記載此事。

原來羅麗萍與李堅並不認識，如今卻因廠裡罷工牽連他們，大家成了真摯的難友，逐步建立了感情，俗話說“有情人終成眷屬”，抗戰勝利後，羅和李結婚了，他們在獄中相識，真個是“獄為媒”啊！在托派同志中，一時傳為佳話。

抗戰勝利後，羅仍在綢廠做工，李辦了一所民校，開展掃盲運動，他們的日子過得不錯。1948年冬，正當他們高高興興地歡慶結婚一周年的那天晚上，國民黨的軍警把他倆抓去了！那時候國民黨在戰場上兵敗如山倒，在上海則到處亂抓人，原來國民黨到立信會計學校抓共產黨，曾在該校讀過書的阿陶，受到牽連，陶是托派，人已去了廣東，不在上海，軍警只在她房裡搜出許多托派刊物，又看到李的結婚照，因而牽連到李家，不問青紅皂白，便把李堅和羅麗萍抓去，關押到威海衛路一處臨時拘留所裡，他們根本與此案毫無關係。羅被關押幾天後放了出來，李則被押到北四川路國民黨的警備司令總部大牢裡，這裡是反動派

屠殺革命志士仁人的大本營，當年爲了鎮壓電車工人罷工，王孝和烈士就是從這大牢裡被拖出去槍斃的。當時有個《觀察》雜誌，蔣介石認爲它洩露了軍事秘密，於是下令把雜誌封了，把編輯和到雜誌社去的人統統抓起來，一抓就是幾十人！國民黨反動派對托派也毫不放過，但李與此案毫無關係，羅出獄後，在外邊膽子更大，出入警備部、警察局，橫衝直撞，並與其他一些被捕的家屬四出奔走營救，使得輿論嘩然，1949年2月11日大公報刊出《政治犯百名 家屬盼早釋》的報導，其中就有李的名字，被押者家屬具呈市參議會轉警備部請求早日審理釋放。國民黨當局無奈，幾個月後李才准於交保釋放。

1949年春，國民黨已兵敗如山倒，上海處處瘋狂抓人，李堅出獄後，隨時有再遭逮捕的危險，夫婦商量，決定離開上海，暫回南方阿李的老家去。

他們回到廣州，與阿李的父母在一起，羅進了廣州毛麻廠，李在米廠做會計，生活上一下子安定下來了。羅從未織過麻紗，以爲進廠後要學一下才行，那曉得織機都是一樣的原理，而且織綢更比織麻精細得多，所以上機就能操作了。她在廠裡雖然言語不通，人事陌生，可是由於她對人真誠，工友們都很喜歡這位上海人，很快就結交了幾位要好的工友。那時廣州已臨近解放，國民黨的官僚把資金抽走，不久工廠便關閉了。後來羅與其他幾個工友一起去香港一紗廠工作，直到廣州解放後，毛麻廠復工才回到廣州來。

解放後的毛麻廠開展勞動競賽，搞得熱火朝天的，羅積極工作，產量高，質量好，多次受到廠部表揚；李堅在米廠做會計，在“三反五反”運動中，站穩立場，揭發了資本家偷稅漏稅的違法行爲，爲社會建設貢獻自己的力量，滿以爲可以太平無事了，其實這不過是主觀願望而已，中國托派長期被中共污蔑爲漢奸、特務、間諜……十惡不赦，當年斯大林反托的殘酷歷史，必將在新中國重新上演，一場更大的災難正等待著他們啊！她非常懊悔：去了香港爲什麼又鬼使神差地回到大陸來？如今再想出去也沒有辦法了，只有束手待擒，任由厄運去擺佈而已。

1952年12月22日，正當他們虎視眈眈地迎來結婚五周年紀念的那天晚上，他倆雙雙被捕了，這是他們

第三次被捕！原來在他們被捕的同一天，全國托派被共產黨“一網打盡”！羅李因有上兩次被捕的經驗，遇事並不驚恐，鎮定自若，自己一生光明磊落，沒有幹過爲非作歹的事！兒子和媳婦的被捕，受害最慘的是那年老的雙親，那時候家人被抓，不知去向，無法接見，生死不明，禍從天降！他母親天天求神拜佛，盼星星盼月亮，盼他們平安歸來，幾乎成了瘋老太！其父不久中風，還等不到兒子刑滿釋放，已含恨離開了人世！

他們被關押第二天，開始審訊，跟過去在敵偽和國民黨監獄審訊不同，讓你坐在矮凳子上，好像心平氣和的樣子，要你交待罪行，反覆說什麼：“坦白從寬，抗拒從嚴”。“我沒有殺人放火，沒有幹過壞事。”李堅說。

“你是反革命，罪惡深重。”

“我沒有反對革命。”

“你反對共產黨，就是反革命。”

“我沒有反對共產黨，只是政見不同而已，你們容不得不同政見者。”

開始審訊還讓你爭論幾句，後來就不耐煩了，但他們不像敵偽或國民黨那樣拳打腳踢，用刑逼供，而是採用更殘酷的辦法：疲勞轟炸！幾個人審了個把鐘頭，又換一批人來審，有幾次被連續五六小時之久，使你疲勞不堪，昏頭昏腦，神經錯亂，言語失常，比之挨幾下拳腳還更難受！那時他只抱著一個宗旨：絕不出賣同志！革命者寧可犧牲自己，一切由自己擔當起來，出賣同志是最卑鄙的！其實，我們被捕那天晚上，全中國的托派及其同情者都在同一時間被關進大牢了。

後來，審訊人員乾脆對你說出某人在某地與你見過面，人家都交待了，你還隱瞞什麼？我便知道某人也被捕了，於是才談與他的關係，也不過是在一起學習討論過什麼問題等等。李堅被單獨囚禁，日夜戴著腳鐐手銬，坐臥不得安寧，吃飯解手也不自在，這也是一種逼供的刑罰！直到他開了口，才解除手銬，個把月後才卸下廿幾斤重的腳鐐，後來再沒有提審過。

一年多後，他們才莫須有地被判“反革命罪”，勞動改造，羅判刑5年，李判刑15年，李堅衝著法官說：

“我沒有反對革命！”那些戴著眼鏡的法官狠狠地瞪了他一眼，說：“可以上訴。”如今是共產黨的天下，天下烏鴉一樣黑，到那裡去上訴啊！

宣判後不久，他們被押送去湖北勞改。一天早上，羅被帶出監獄，兩個人意外地重逢了！他們用驚喜的眼光對視著，好久好久！雖然不許講話，但眼神代替了語言，好像在互相鼓勵著：“堅強點，沒什麼可怕的！”在火車上，押送人員讓他倆坐在一起，同扣在一付手銬上，這也許算是人道主義待遇吧，好好一對年輕夫婦，已被隔離囚禁一年多，以後還不知再隔離多少年！他們依偎在一起，心情無比激動，該有多少話兒要說啊，唯有盡在不言中。從廣州到武漢，車行30多小時，借著火車的隆隆響聲，他們細聲地耳語著。羅知道丈夫判了15年刑，此去不知能否再活著回來？今生今世不知能否再見面？想到那悲慘的命運，她忍不住淚水直流，但絕不能哭啊，無論如何也要使丈夫放心。她親切地對他說：“我等著你，不管10年20年或者更久更久！”

他們在武漢二監獄停留了幾天，等待中南區部分托派集中一起，然後分配到各處勞改，羅被分配在二監獄被服廠，李在漢陽新生磚瓦廠。他們又依依不捨地分了手……

1957年5月，羅刑滿釋放後，又從廣州回到上海，與她80高齡的老母共同生活，妹妹介紹她到綢廠做臨時工，她便天天大清早站在廠門口，等待有人請假缺勤，就進廠幹一天活拿一天工資。後來逐漸做熟了，也由於她是綢廠出身，技術比人好，工作踏實，廠裡對她很不錯，一年多下來，恰逢有個轉正的機會，便把她轉為正式工人，生活才算安定下來。

羅的轉正，與她隱瞞被捕的歷史有關，那是“階級鬥爭為綱”年代，如果廠方知道她是個“勞改釋放犯”，就肯定不會轉正了。但這個隱瞞也是暫時的，58年開始“反右”，政治運動一個接著一個，她再不能瞞下去了，只好作了交待，當時還得到“坦白從寬”的處理，不予追究。但到了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時，日子越來越不好過了，她被列入“另冊”，成為“五類分子”，有一次要把她遣送到農村去，她沒有家鄉，從小就在城裡，一個女子如今要被送到千里

迢迢的西北邊陲去開荒，這是什麼世道啊！幸而工廠要生產，需要技術工人，才把她留了下來，沒有去成，逃過了一次災難。聽說那些被強行遣送去雲南開荒的人，十之八九有去無回的。然而，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來了，一場更大的災難來了！她又被揪了出來，“打倒反革命”的大標語、大字報貼在廠裡，貼到家門口，慘遭批鬥，不是幾天、幾星期，而是了無時日，批鬥別人時也要她陪鬥。“階級鬥爭”越抓越緊，每天除了繁重的勞動外，還要她交待罪行，檢討批判，接受群眾監督改造。廠裡給她做最壞的機子，卻要織出優質高產的絲綢，否則就是破壞生產！在如此殘酷的迫害下，她日不思食，夜不能眠，精神處於極度緊張狀態，她再也支撐不住了，幾次昏倒，後來發現舌頭上長了一顆黃豆大的東西，起先到地段醫院看病，只開了一些消炎藥服用，後來病情惡化，到大醫院去切片檢查，才知道她已不幸患了舌癌！那時候醫院還不知她是“牛鬼蛇神”，仍及時給她切除了淋巴腺，進行電療，搶救了她垂危的生命，否則更不堪設想了！從此以後，她長期病休在家，拿六折工資。然而，“無產階級專政”還是不放過這個身患絕症的女子，還是要她屈辱地每天跟其他“五類分子”一道去掃街！

更不幸的是，她還“株連九族”：她的弟弟，原來開小裁縫店的，因托他為《青年與婦女》雜誌在郵局開戶蓋了個保，“文革”時就把他弟弟打入“五類分子”，被管制多年！每天勞動下班後還要打掃廁所和工廠衛生，別人升級加工資沒有他的份，弟弟有四個孩子，一家六口饑寒交迫。羅那時每月32元工資，總是送弟弟10元，寄廣東公婆10元，自己只留下12元使用；還有受株連的，就是她的妹妹，曾介紹她進廠做臨時工的，與托派毫無關係，也藉故把她送去勞教四年！妹妹的兩個小孩只好寄養在老工人家裡，羅時常去看望他們，像自己的子女一樣的關懷備至。

由於蘇聯赫魯曉夫上台，批判斯大林，中共對托派問題當然有所考慮，1956年的政治形勢似乎寬鬆了些，政府組織托派同案人在武漢參觀學習，57年提前釋放了一批刑期短的，刑期較長的女的假釋，一些男的減了刑，李堅也被減刑五年，減刑書上寫著：“勞

動積極，挑磚每擔30塊”。幹部公然對大家說：“你們這個案子今冬明春全部解決。”

1957年8月，政府組織各地留下來的一批托派，到全國參觀學習，李堅也參加了，一行共20餘人，先在上海集合，然後到北京、瀋陽、鞍山、撫順、武漢，參觀了六大城市，50多個單位，歷時一個多月，走遍了半個中國。參觀回來後，大家滿懷希望，以為將會恢復自由了。然而，政治形勢卻越來越嚴峻，所謂“今冬明春解決問題”已成謊言。

1957年反右，接著大躍進、大辦鋼鐵、大辦人民公社，大放衛星等等一系列政策上的失誤，致使國民經濟陷入困境。從此以後，階級鬥爭的弦越拉越緊，後來刑滿釋放的李堅也不准回上海大城市，要留廠就業，就是說必需留在勞改工廠，幹勞改時一樣的工作，只是給你發點工資，到飯堂去吃飯，晚上照樣學習兩小時，改造思想。平時不准出監獄大門，休息天經批准後可以外出走走，但要按時歸隊，每年有半個月的探親假。難怪人們說：“勞改有期，就業無期”了。

李堅原判15年，57年減刑5年，62年刑滿留廠就業，可以說是釋而不放！每年半個月的親假期，他總是先回廣州看望老母親，然後立即趕去上海，與妻團聚，匆匆忙忙，又得趕回廠去上班。幾十年來都過著這樣兩地分居、人各一方的生活！每當羅想到有朝一日丈夫回到上海，沒有工作，沒有勞保，以後的日子怎麼過啊？於是她更加節衣縮食，有時一隻雞蛋也分作兩餐吃……

1962年底，李堅刑滿，但還戴上“反革命”帽子。1983年，李堅看著一些相處三十多年的難友回歸故里，與親人團聚。而他卻有家歸不得，因為他的妻子居住在上海大城市，不准回去，焦急萬分。幸而他姊姊在美國，華僑家屬可以優待。過去，海外關係，談虎色變，很多人深受其害。現在則相反，經過他姊姊多次去函僑委會要求落實政策，李堅才被批准回上海定居，夫妻團聚。他們從52年被捕分手後，到83年重新團聚，足足分離31年之久！人的一生能有幾個31年啊！這是什麼世道！

李堅回滬後，沒有退休金，廠裡每月只發21.5元生活費，沒有醫療勞保！這21.5元生活費，只夠每

天吃兩碗麵條！20年後，也只增加到121元，相當於最低限度的生活費的三分之一！同樣拿這點無法生活的“生活費”的人還有姜平等人，他們曾寫信向總書記反映情況，要求落實政策，這些信從中央轉到勞改單位，勞改單位回信說：“我們過去是根據紅頭文件處理的”，石沉大海！而上海最後一批同案釋放後的待遇，卻大不相同，不僅分配住房，有醫療勞保，而且每月的生活費也比他們高幾倍！政策是寬大不寬小！羅麗萍望穿秋水，等了31個年，李堅回家後，在居委會搞文教工作，發揮餘熱，夫妻雙雙以為可以安度晚年了，但僅僅過了五個年頭，由於羅在這幾十年間受盡迫害與折磨，癌細胞已經轉移到腹部，醫學也回天乏術，1988年11月11日羅便含恨離開了人世間！這一對摯愛夫妻，只由於追求真理，參加了托派，光明磊落，卻一生坎坷，三進三出牢獄大門，真是世間罕見！

[略有刪節]

紡織工人之歌

青青

轟隆，轟隆，

紡啊，織啊！

我們目不轉睛，手不停動，

從朝到晚，從黑夜到天明，廿四小時不停。

我們把棉花紡成紗，

把紗織成布，

把布裁成衣裳，

穿在人民身上。

任空中的纖維毒害年青的肺臟，

我們紡出了我們的痛苦，織出了我們的悲哀，

紡進了我們的青春，織進了我們的幸福，

紡出了我們的希望，織出了我們的偉大的理想！

悼念老戰士章華同志(1924-2008)

十月評論社同人



章華同志原名章宏業，又名章濤，江濤，1924年11月12日出生於浙江溫州市，非常不幸在本月3日病逝於加拿大溫哥華市，終年84歲。這樣又喪失了一位很優秀的老同志，我們深感悲痛。

章華同志的家鄉溫州，是中國托洛茨基主義運動的四大基地之一，他在求學時期已參加這個運動，成為托派一份子。1944年，他考進了浙江大學，與同志們一起研讀政治理論，參加抗日活動。

1947年，章同志轉到上海工作。是年底，上海托派組織成立了社會主義青年團(S.Y.)，他被選為市委書記，並參加公開刊物《青年與婦女》(後改名《新聲》)的編輯撰稿等工作。

在解放軍進佔上海後，他和一些同志被拘捕，不久獲釋，自知不能再留下工作，於是南來香港，避過了1952年冬至日全國托派份子同遭拘禁，長期喪失自由的災難。

章同志在港響應當時倡行的「到工人中去」的號召，到九龍紗廠工作，一方面向工人學習，改變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的意識；另方面也教育工友接受馬克

思主義思想，吸收為戰士，成立工人支部。他當時取名遼遠，意味要像白居易詩句「目遠心遼然」那樣做人。他當日寫的《紡織工人之歌》(載於本刊1995年第5/6期)，便申訴出紡織工人的苦況和希望。

在工作之餘，他以莊思筆名，翻譯出版了戚·格瓦拉著的《古巴革命戰爭的回憶》，在1973年由信達出版社印行。他再用青雲筆名，撰寫了《戚·格瓦拉為革命獻身的一生》一文(載本刊1997年第三期，總第178期)，高度讚揚格瓦拉。

章同志為人十分慳儉，對生果菜蔬也揀過時而價廉的買，在溫哥華更有時到街道旁執拾人家丟棄的食品衣物來食用，儘管他的經濟並非緊絀。他一直以繳交黨費來資助出版事業。移民加國後曾托友人轉交一筆為數不少的款項來支持出版。

他長期過著獨居生活。早在九龍紗廠工作時，曾有過一位很要好的女同志兼同鄉相愛；但她返內地後不再來港，各散東西，他為此寫了一首《西風在吹》，抒發內心的懷念。他後來一度結婚生下的兒子，又不幸少年早逝，加劇了他下半生的孤寂寡歡。尚幸他高瞻遠矚，理智樂觀，意志頑強，日常又多以跑步運動和注意飲食來維持健康，但最後仍不能扭轉「生老病死」的客觀規律。在生命後期，他發覺自己頭腦已大大退化，記憶力差；有一次竟暈倒在街上，由警察救起送醫院治理，並安置在護老院內，靠人護理照料，度過好幾個寒暑，直至呼出最後一口氣。

章同志雖然跟著同輩代的戰友一個個離開這個世界，他矢志要合理改造這個世界成為共產主義社會的目標雖仍遼遠，但他信奉的這個科學理念終會有逐漸實現的一天；他所譯出的古巴革命的勝利，便是好的例證之一。他經過莊重思索而譯成的這本中譯本，將會同他的奮鬥事蹟一起，留存於後世，供人研究、借鑒。

2008年4月4日

威·格瓦拉為革命獻身的一生

青雲

從「古巴革命戰爭的回憶」（威·格瓦拉著 莊思譯 信達出版社印行）一書，我們知道古巴人民經過艱苦激烈的游擊戰爭，推翻了巴蒂斯塔反動政權，建立一個工農階級的政權。這個政權是拉丁美洲人民首個公然向美帝國主義統治挑戰的權力中心。

在古巴革命中，除現任總統的卡斯特羅外，另一位起過同樣重要作用的領袖，便是威·格瓦拉。

他出生于阿根廷，經過危地馬拉、墨西哥，再與卡斯特羅等83個古巴革命志士一起搭上機動帆船「嘉拉馬」號，在25/11/1956清晨兩點鐘，在墨西哥吐潘港啓航，在十二月二日清晨到達古巴某海岸登陸，開始了古巴革命戰爭的序幕。

威在古巴革命勝利之後，他立刻投身新政權的經濟建設與外交工作。他不以個人權力官位為滿足，不以享受古巴革命勝利的果實為滿足，立即轉向更加需要革命的其他國家，其他地區，其他被壓迫的人民，特別是他較為熟悉的拉丁美洲，拉丁民族，被壓迫的黑人民族，什麼地方最需要革命，他立即奔赴什麼地方，他是不斷不停為全世界被壓迫被剝削人民的革命而獻身的真正革命家。

在1965年四月，他帶領八百古巴黑人兵士戰士來到比利時統治下的非洲剛果（原名札伊爾），支援當地的民族解放鬥爭。

帝國主義者為要控制剛果的豐富資源，便派遣歐洲招募來的僱傭兵團來協助蒙巴托勢力，奪取了政權。

由1965年六月到1966年一月，古巴兵團與剛果抵抗運動及盧旺達七百名戰士併肩作戰。

格瓦拉與卡斯特羅都在很大程度上，獨立于蘇聯與中國的官僚層之外，而建基于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鬥爭之上，古巴革命已沿著第三世界革命的脈絡發展，其關鍵便在于非洲各國的解放鬥爭。

威·格瓦拉估計：非洲是最重要的戰場，最有勝利的可能。但也有重大的危機，而剛果則是關鍵的所在。

在1964年十二月，格瓦拉在聯合國大會上，就美國以及非洲的「白人種族帝國主義」對待屠殺一萬剛果平民慘案，作了一次悲憤的控訴。

在紐約一次群眾示威行動中，格瓦拉由一位代表宣

讀他的熱情的號召：「親愛的兄弟姐妹們，我很高興能與你們走在一起，我代表古巴人民謹向你們致以熱情的問候。團結起來，我們一定勝利！」

在二月二十日，威發表了他有名的亞爾及利亞的演講，批評了蘇聯的所謂援助第三世界政策：「社會主義諸國竟採取一如資本主義者同樣的商業措施，把自身置於與帝國主義者同樣的剝削者的地位上」。在1965年四月，威突然從公開政治場合中消失。

卡斯特羅說：「威現在正在幹對革命最有用的事。」

這個時期，局勢逆轉。威秘密來到剛果時，帝國主義者們進行國際規模的反攻，不少革命領袖遭殺害，1965年三月美海軍在越南大南登陸，展開一場殘酷無情的戰爭，剛果解放軍也受到中蘇官僚層分裂與壓力而內部分裂，對古巴人民出於捍衛第三世界的正義行動竟抱有偏見與妒忌。

在剛果經八個月反帝戰鬥之中，威幾乎被白人僱傭軍所殺，不得不轉進坦桑尼亞與古巴部隊一起行動。不久，古巴部隊便回到古巴，其中一部份人便追隨威在1966年十一月轉進玻利維亞。

威是秘密地在1965年先回到古巴再秘密地去玻里維亞。一如既往，繼續站在第三世界被壓迫人民的戰線之上。他率領一支游擊隊與該國的軍事獨裁統治作戰，由于受傷而被俘。玻利維亞統治階級對威所代表的革命是多麼恐懼，終于對這無力反抗的俘虜即加殺害，甚至連他的屍體也加以毀滅，以免引起第三世界人民的記憶與懷念。

今天你們可以看到非洲許多城市尤其在盧旺達首都，許多人都穿上印有威·格瓦拉式的T恤，印著「永遠前進，直到勝利！」的口號。

曾與威併肩作戰過的在盧旺達、札伊爾的戰士們心目中，他的形象與傳奇永遠成為他們勇往直前的激勵。在今天對於千千萬萬戰士們來說，必須從威的偉大的形象、獻身的榜樣的動人故事中，吸取力量，吸取教訓。

今年是威的三十周年忌辰，1965-1966時期這段激勵人心的深刻記憶，第三世界，非洲人民以及全世界勞動人民必將威所代表的革命精神與經驗，永誌不忘！

（原刊《十月評論》1997年第3期）

西風在吹

白田

每當深夜我從幻夢中醒來，
似聽到夜鶯在山林中歌唱，
夜鶯啊夜鶯，
你是為被黑暗所統治的大地悲泣，
抑或替我向半山小屋裡的姑娘，
傳遞情曲？

吹啊南風！
請把我的歌聲，
吹上青青的山坡，
好使我傾慕的人兒，
知道有人永遠為她的健康祝福！

東海正在漲潮，
我愛情的心激動起來了。
我永愛你，我的幽蘭！
我對你的愛勝過汪洋，
它只有高漲，沒有退落，
直到我走完人生旅程！

陋室曾因你而生色，
與你共餐，任何食物都增添了鮮美。
你在身旁時，我總是勇氣百倍，
你的悄語在我都是音樂。

啊姑娘，
我把一倍的愛獻給那鵝蛋俏臉，
我要把十倍的愛獻給
你那為人世不平而噴湧的熱淚，
你那永為真理所牽引的慧心！

我的愛沒有計算，沒有陰謀，
我從不浪擲感情，
但當我一旦發現一個理想，
我就把這顆赤誠的心獻上！

縱有千般的嬌容美貌，
到頭來都要化為秋天的落葉而枯槁。
時間是無情的劊子手，
青春終於向它低頭！

你的明眸皓齒也抵抗不了時光的欺凌，
正如我生命的河床已遭多十年八年沖刷而漸涸。
但你已決心把一生獻給那個理想，
因此我發現了人世間的最美最善！

那悠遊的白雲每日都來探望快樂的人間，
青山道上有無盡的曲曲彎彎。
荖灣海面有不停的風帆往返，
這青青的山谷依然遙對浩渺的太平洋！
這一切都沒有改變，
難道就只我這一片癡情應該被割斷，
像那些善良的頭顱，
在暴君的刑刀底下一樣！

今天為甚麼晴朗的天氣卻只是一片昏暗？
為甚麼任輕狂的西風吹得人心亂，
為甚麼溪水流下卻聽不到活潑的淨淙？
而那悠然移行的白雲啊，
卻像亂絲亂捲？
親愛的，
這一切都因我仍得不到你的答覆。

此刻請你明確答覆我吧，
好明確地把我命運宣判。
讓我攀登幸福的樂園，
抑或打落痛苦的深淵？
如果我終因愛你而被送落苦海，
我仍要懷著對你美好的記憶而欣然就道！

（原刊《十月評論》1995年第5/6期）

迎合員警與自衛隊的日本最高法院 與警告日本政府違憲的名古屋高等法院

趙京譯

四月十一日，日本最高法院第二法庭作出支持東京高等法院、否定散發反戰傳單被告三人（大洞俊之、高田幸美、大西章寬）上訴的不當判決，這表明了最高法院迎合福田政權的員警、自衛隊的權力意志，爲了達到壓制反戰運動的目的，不惜踐踏表達自由的憲法權利。

自衛隊立川宿舍沒有進出口大門，也沒有守衛人，平常不斷收到各種商業傳單，也包括關於招募自衛隊的政府廣告，所以在初審時，認定沒有得到住民的同意就散發傳單雖然造成了“侵入”的事實，卻不至於刑事懲罰。特別在初審的第二次公開審判時，立川宿舍的管理人（自衛隊的厚生課長）出庭作證道：一、防衛廳傳達了通知，一旦發現反對自衛隊出兵伊拉克的傳單，要立即向員警報警、向自衛隊報告；二、發現傳單後要提交“被害”報告；三、管理人本人去員警報警時，別人已經把“被害”報告準備好，只須他簽字、蓋章即可。這表明國家權力機構早已策劃好鎮壓反戰運動。事實上，日本共產黨在其機關報《赤旗》2007年10月12日號報導了自衛隊“情報保全隊”參與鎮壓散發反戰傳單的內部資料，並在國會上提出這個軍隊介入內政的重大危險。但這次最高法院完全抹殺這些證據，反而推翻初審的無罪判決理由，聲稱初審的判決會帶來法制秩序的混亂，暴露出最高法院爲了維持日本國家體制的階級本性。

幾乎在日本最高法院作出踐踏憲法權利的同時，名古屋高等法院四月十七日在“阻止自衛隊向伊拉克派兵”審判中，卻作出歷史性的判決。此判決雖然拒絕了原告要求阻止日本政府向伊拉克派兵並賠償經濟損失的要求，卻明確宣佈航空自衛隊在伊拉克向美軍等部隊運輸兵員、物資是違反日本憲法第九條的。“03年5月布希總統宣佈大規模戰鬥結束後，美軍等各國部隊仍然在法魯甲、巴格達等城市出動大量兵力討伐武裝勢力。不但造成戰鬥雙方的大量死亡，也殺傷大量包括孩童在內的民間人，爲害深重。”特別是巴格達，

應該屬於日本制訂的“伊拉克特別措施法”指定的“戰鬥地區”，而航空自衛隊向戰鬥地區的巴格達運輸戰鬥兵員，已經構成了武力行使的一部分。這樣，即使“伊拉克特別措施法”合憲，航空自衛隊已經違反了禁止武力活動的“伊拉克特別措施法”本身，也違背了憲法第九條第1項。

這個判決是對日本政府追隨美國侵略政策的全面否定，被原告律師團稱爲“自從日本國憲法制定以來，正確理解日本憲法的和平主義根本原理並適用於政府行爲的憲政史上最優秀的歷史性判決”。更巧妙的，鑒於日本最高法院的反動本質，名古屋高等法院在形式上拒絕了原告的賠償要求，使被告日本政府成爲勝方。在所有圍繞自衛隊派兵的訴訟中，只有另一例在高等法院判決日本政府違憲，但作爲敗方的日本政府上訴並在最高法院得勝。這一次，因爲勝方無法上訴到最高法院、敗方（原告）的目的不在於經濟賠償也不上訴，從而確定了伊拉克派兵違憲的結論。按三權分立的原理，日本政府應該尊重法院的判決，立即停止違憲的伊拉克派兵。但福田政權並不理會法院的判決，繼續堅持自己的蠻橫邏輯和決策，使日本法律陷入“泥潭”狀況。

[趙京譯自新時代《橋樑》週刊2008年4月21日、28日]



廢除核武器的國際政治條件

趙京

二〇〇七年一月四日，美國前國務（外交）部長舒爾茲、基辛格、前國防部長佩里、前參議院軍事委員會主席山姆·那恩在華爾街日報聯名發表“一個沒有核武器的世界”的公開信。我當時沒有讀到此信，後來在斯坦萊基金會發行的刊物中讀到一個專家的響應文章，第一個反應是：“人將去也，其言也善。”

今年一月十五日，華爾街日報再次刊行此公開信，並有不少名流連署。華爾街日報次日登載一個級別稍低的前美國政府官員的反駁信，代表美國政府的主流立場。我不由得也致函華爾街日報。沒想到，華爾街日報在十九——二十日週末版登載了我的短信。我以自己清華大學工程物理系的背景建議這些美國的冷戰或後冷戰“設計師”們首先要向全世界道歉，因為正是他們鼓勵了世界上所有的權力都試圖擁有核武器。

(http://online.wsj.com/article_print/SB120070618605501959.html)

與這幾位已經喪失對美國核政策影響能力的退休“武士”相比，幾乎同時(二〇〇七年一月三十一日)在華爾街日報發表“核威脅”文章的戈巴契夫更有說服力。但這位曾運用權力多少減輕了人類核威脅的最後一任蘇聯帝國的頭目，卻被國際政治的現實冷落遺棄，因為另一個超級強權非但沒有在蘇聯解體後裁軍，反而加強了對世界的單獨軍事支配行動，造成了更加不安的世界局勢。現在，印度和巴基斯坦在後冷戰時期加入“核大國俱樂部”，以色列毫不抵賴自己擁有核武器，連貧困的朝鮮北方也“悍然”(中國政府用語)進行核武器試驗。當整個世界目睹正是因為缺乏“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而被入侵絞首的伊拉克首領的命運時，還有什麼理由非難北朝鮮、伊朗等國的統治者們走向核武裝的野心呢？每當我們想到整個人類的命運隨時有可能被幾個掌握核按鈕的國家頭目毀滅這個簡單事實就不寒而慄，人類已經有足夠的聰明和能力毀滅自身，卻沒有基本的智慧廢除核武器。

核武器產生於戰爭，戰爭產生於人類的罪惡



TOP SECRET

TUBE ALLOYS

Conclusions of discussion between the President and the Prime Minister at Hyde Park, September 18, 1944.

1. The suggestion that the world should be informed regarding Tube Alloys, with a view to an international agreement regarding its control and use, is not accepted. The matter should continue to be regarded as of the utmost secrecy; but when a "bomb" is finally available, ^{it must be used} it should be used against the Japanese, who should be warned that this bombardment will be repeated until they surrender.
2. Full collaboration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British Government in developing Tube Alloys for military and commercial purposes should continue after the defeat of Japan unless and until terminated by joint agreement.
3. Enquiries should be made regarding the activities of Professor Bohr and steps taken to ensure ^{that} he is responsible for no leakage of information, particularly to the Russians.

Churchill's copy of the Hyde Park memo reveals his thinking through his handwritten comments.

政治制度。只要人類依然擺脫不了國家機構的暴力宣傳，以為國家暴力在人類的社會秩序中必不可少，就擺脫不了戰爭、擺脫不了核武器這個戰爭最極端手段。而最早、最全面認識到核武器對全人類威脅的正是最受尊敬的現代物理學創始人之一：小國丹麥的尼爾斯·波爾。在結束對美國同行的曼哈頓計畫考察後，波爾一九四四年五月去英國，向邱吉爾首相表達了對即將到來的核軍備時代的擔憂，並建議核秘密應該為全人類所共有而加以管制。邱吉爾一九四四年九月十九日手寫批准的一份“絕密”檔則反應了所有國家權力頭目的態度：核武器制度是國家的最高機密，波爾這樣的科學家要被嚴加看管起來，謹防洩密(Cynthia Kelly edited, The Manhattan Project, p105. New York: Black Dog & Leventhal Publishers, 2007.)。

雖然愛因斯坦等猶太人科學家出於對納粹德國的恐懼，建議推動美國政府研製原子彈，但核子物理的知識和技術一旦普及，國家權力就很容易找到

那些二、三流的科學家來從事核武器的開發。年輕的奧本海默雖然參加過社會主義團體，但他沒有諾貝爾獎那樣的資歷足以對美國的政策說“不”，正是這樣的領導第一顆原子彈技術開發的理想人選，後來的從事核子物理專業的蘇聯科學家（Kurchatov等而不是知名的卡皮查），以及更後來的印度、巴基斯坦（加上以色列）等的核武器開發人員，已經完全不可能具有波爾那樣的人類胸懷了。任何對國家權力如何利用核武器有絲毫懷疑的相關人員都受到監控和迫害。甚至連奧本海默也逃不出被懷疑的命運。波爾於一九五〇年六月九日致函剛成立的聯合國呼籲各國之間和平利用、自由交流包括核子物理在內的科學與技術，小國丹麥倒沒有對年邁的波爾採取行動。羅素與愛因斯坦等於一九五五年七月九日簽署警告核武器冷戰的宣言後，羅素被迫離開大學，愛因斯坦被聯邦調查局FBI收集了大量黑材料，以備把他趕出美國。

那些沒有國際聲望的人更容易被國家權力處置。一九四四年底，納粹德國的戰敗近在眼前，大

家都知道德國根本沒有開發核武器（這一點，也是德國核子物理家海森堡等人的自負），一些參與曼哈頓工程的科技人員開始動搖、討論是否該放棄此工程。曼哈頓工程之外的科學家James Franck（諾貝爾獎得主）、Leo Szilard（愛因斯坦在德國的同學，起草愛因斯坦致羅斯福的信）等組織155名科學家要求杜魯門總統不要對日本投入原子彈，但代表美國政府意圖的奧本海默等當局宣佈這些科學家並不具有高於普通公民的特權去影響政府的決定，而政府已經投入大量人力、財力成功地製造出原子彈，豈有不顯示自己威力的理由？當Joseph Rotblat向當局說明他不繼續參與此工程的決心後，當局第一個反應就是把他當間諜來處置，後來迫使他以“探望在波蘭的妻子”為藉口請辭才放他去英國。在他一九四四年聖誕前夜離開工程的車站上，他發現自己的行李全部失蹤了。他後來從事和平的核醫學研究，並創立Pugwash組織推動國際和平事業，於一九九五年與該組織獲得諾貝爾和平獎。

最新的美國聯邦政府預算資料(單位：億美元)

主要部門	2001 實際	2008 實施	2009 要求	變化			
				2008-2009		2001-2009	
				美元	百分比	平均	累計
農業	192	218	208	-11	-4.8%	+1.0%	+8.0%
國防	3025	4795	5154	+360	+7.5%	+6.9%	+70.4%
教育	401	572	592	+20	+3.5%	+5.0%	+47.6%
能源	200	239	250	+11	+4.7%	+2.8%	+24.9%
健康與人事服務	540	719	704	-15	-2.1%	+3.4%	+30.2%
國土安全	140	349	376	+27	+7.7%	+13.2%	+168.8%
住房與都市開發	284	374	385	+11	+2.9%	+3.9%	+35.7%
法務	184	227	203	-24	-10.7%	+1.2%	+10.4%
國務與國際項目	217	329	383	+54	+16.5%	+7.3%	+76.2%
退伍人員事務	224	394	448	+53	+13.5%	+9.1%	+100.1%

主要部門	2001 實際	2008 實施	2009 要求	變化			
				2008-2009		2001-2009	
				美元	百分比	平均	累計
宇航	143	171	176	+05	+2.9%	+2.7%	+23.6%
總計	6438	9414	9876	+462	+4.9%	+5.5%	+53.4%

當美國人民被動員投入世界大戰時，被政府告知是爲了“結束戰爭的戰爭”。世界大戰和冷戰早已結束，但美國政府不但沒有解散違背建國理念的常備軍，反而越發擴軍備戰。

據小布希當局提交的2009年財務計畫<http://www.whitehouse.gov/omb/budget/fy2009/summarytables.html>，在總計9876億美元的預算中，國防部占5154億，國土安全部占376億，退伍軍人事務部占448億。不計能源部250億預算中的核子試驗研究以及其他部門的軍事性開支，美國政府軍事預算達5978億美元，占總預算的61%。與此同時，國務部與國際項目383億美元，占總預算的4%；教育部592億美元，占總預算的6%。我們還可以比較：從2001年到2009年的八年小布希當政期間，國防部（3025億）、安全部（140億）和退伍軍人事務部（224億）的開支從3389億到5978億，猛增76.4%，難怪這個小小的地球越來越不得安寧。如果美國民眾得到足夠的資訊教育，知道我們（包括交稅的筆者）的聯邦稅大多數用於軍事開支，如果國會議員有起碼的良心拒絕執政當局的軍事預算（讓我們夢想一下把軍事開支減少一半），這個世界將會獲得多大的和平！核武器不能廢除，戰爭不能避免，根本的原因是人類沒能採取公正、公平的社會秩序/制度，而推動社會公正的最有效方式就是每個民眾（無論其法律地位如何）首先起來反對、抵抗自身政府權力的腐敗、壓制、不公，而不被自身政府欺騙、驅動去反對別國的民眾。

當我一九八〇年考入清華的工程物理系時，有一個同學（他的名字叫張靜波）聲明不能學習殺人的核子物理而要求調換專業，當他不能如願後，毅然

退學，給我們很大的震動。我後來參觀廣島原子彈爆炸紀念館時提起此事，日本友人們也很感動，堅定了日本非核的信念。我到美國後參加和平/正義運動，知道有一些公民在交稅時特別注明拒絕交付軍事開支的那一部分稅金，並準備受政府懲罰。據說，聯邦稅務局因爲害怕引起官司招惹媒體報導，加上這些人的收入並不高，至今沒有採取強制行動。但這些行爲都被FBI等記錄在案，很有可能被政府在其他方面暗算。據華爾街日報報導，有一些阿拉伯出生的“永久居民”（綠卡持有者）進入美國時，被國土安全部扣留，被迫簽字自願回到美國的阿拉伯社區充當特務才能入境。當筆者于2004年申請十幾年沒有的護照時，被移民局告知：FBI正在調查你的背景，在得到FBI的“澄清”之前，移民局無法批准。FBI的背景調查會拖多久呢？“爲了國家安全，沒有限制”。這樣的抵制本國政府的方式當然比慣常的反對別國政府軍事擴張的行爲困難得多，但只有這樣的伴隨自我犧牲的爭取社會公正的運動，才能夠制止本國制度的倒退，才是唯一創造國際和平條件的政治途徑。實際上，當我們想到United States of America（美利堅合眾國）這個名詞概念的發明者、把北美殖民地的獨立從願望變爲不可逆轉的常識的第一位“建國之父”湯瑪斯·潘恩最後被美國政府拒之境外的話，我們已經從道義上戰勝了任何國家強權。如果各國的公民們都以不同的形式行動起來抵制本國政府的軍事政策，這個世界才有和平的可能，才能廢除核武器、常備軍、戰爭與一切人類罪惡。

2008年2月25日 美國聖拉蒙市

出席雪佛龍公司股東大會

趙京

兩年前，當我剛搬到三藩市海灣東部山巒美麗的聖拉蒙市時，發現雪佛龍Chevron的總部竟然在這裏。去年，我有意圖地買下了雪佛龍的股票。今天早上不到八點，我開車到雪佛龍總部正門時，遇到我預想到的近百名抗議人士。這些以年青人為主體的戲劇性的衣著（白大褂）、美觀的設計標語以及音樂般的口號，正是我熟悉的無政府主義“直接行動”的抗議方式。實際上，我三月十六日（周日）去雪佛龍在Richmond港灣的煉油設施抗議時，就知道了這些以伯克利大學學生為主的人士。那一次有近三百人參加，象徵性地把煉油廠的道路和港口都堵塞、封鎖了起來，大家載歌載舞一派節日景象，把我帶回到一九八九年春天在日本組織聲援中國民主運動的情景。我當時與他們的組織者約定，要來參加今天的雪佛龍股東大會。比起我們都敬佩的美國無政府主義鬥士柏克曼，今天我們不必持槍去懲罰鋼鐵大王卡內基的代理而坐牢了。另一方面，比起抗議那些躲藏在層層裝甲警衛包圍中的全世界統治階級的代理人政客們，在股東大會上直接推動人權政策等，更有效果和價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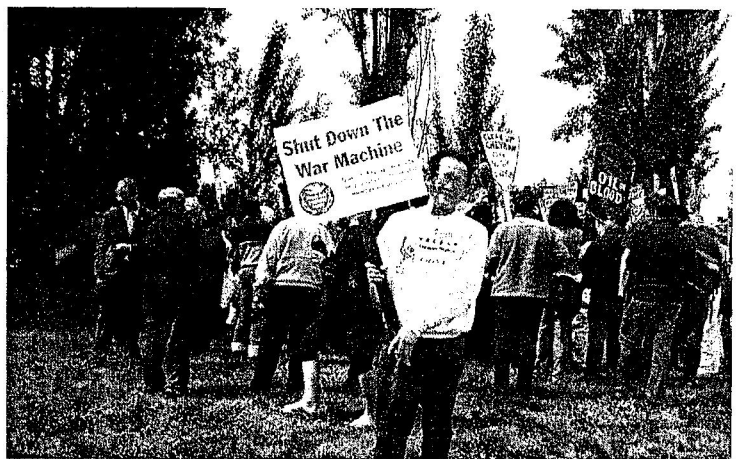
除了公司正門外的警車，我注意到公司裏也停了兩輛警車，沿途有不少保安人員和公司職員，頗有“如臨大敵”之感，我的手機和相機也被要求放回車內。當我在會場入口看到幾個印第安裝束的人士，一下子意識到這家世界第二大石油公司在全球爭搶資源時，積怨不少。

近來油價不斷高漲為雪佛龍帶來豐厚利益，其2007年總產值達到2141億美圓（與八千萬人口的越南整個國家的總產值接近），股票也上升27%。公司的管理層很自信，會議很快順利地通過了董事會提出的選舉新董事會、承認會計公司、增加股票發行的三個提案。

第4號提案要求CEO（公司首席執行官）和董事會主席由不同的人擔任。總部設在德州的世界第一大石油公司（也是世界第一大公司）Exxon Mobil今天也同時召開股東大會，其原初公司的創始人洛克斐洛的

家族等大股東提案也要求CEO和主席由不同的人擔任。這兩個相同的提案都被否決了。我今天觀察雪佛龍的CEO兼主席D. J. O' Reilly主持會議的表現，發現他不擅長應對雪佛龍這樣的超級跨國公司必須面對的政治性事務，確信有一個獨立的董事會主席（例如十名董事之一的原聯邦參議員S. Nunn）是必須的。近年來，相同的提案在別的公司股東大會也不斷提出，可能會花上幾年努力，形成一股強大趨勢才行。

第5號提案是要求採納全球性的人權政策。這個提案在2006年和2007年的股東大會上已經被提出，雖然沒有被通過，但達到了相對的比例，故可以重新提交。一位三藩市大學的教師發言，說明這是三藩市大學提出的唯一提案，鑒於雪佛龍在那些內戰、無法制、腐敗蔓延、沒有勞工和環境標準等國度操作，有必要採納人權政策維護股東的價值和公司的形象。我站起來發言，首先感謝雪佛龍股東大會給我發言的機會，因為我雖然想出席在北京的中國石油天然氣公司4月15日的股東大會，我的清華校友胡錦濤、吳邦國等權貴十幾年來非法剝奪我的公民權不讓我進入中國。我以自己在中國、日本以及美國受到的人權侵害的親身經歷，說明公司不能把保護人權的責任推脫給國家權力，因此支持這個提案。此提案受到24%股東的支持，雖然這一次沒有通過，明年還會被提出。去年在Yahoo



股東大會上認識的紐約市政府的Dougherty，上月在Google股東大會上認識的大赦國際的Tony，後來也發言支持此提案。

第6號提案要求公司報告在加拿大開採油砂時的環境影響；第7號提案要求採納溫室天然氣排放的目標值；第8號提案要求制定選擇所在國家操作的綱要；第9條提案要求報告所在國家的法律狀況。整個會議變得熾烈起來，要求發言的人很多，很多發言因時間限制被強制打斷，不得放到表決後的問答時間裏進行。最多的發言抗議圍繞雪佛龍在厄瓜多爾的環境污染問題，那幾位從厄瓜多爾來的原住民實際上正在與雪佛龍打官司。有一個代表緬甸的婦女要求雪佛龍向軍政府施壓以改善人權，O' Reilly說雪佛龍已經要求EU和UN向軍政府施壓，並捐款救災。最火爆的情形是O' Reilly與一個來自尼日尼亞的黑人的對罵：O' Reilly聲稱黑人屬於犯罪集團，綁架雪佛龍的雇員；黑人則指責雪佛龍雇傭員警直升機殺害當地居民，他們也正在起訴雪佛龍。我座位邊的一個婦女問我，是否大家都有發言權，我鼓勵她講。她是伊拉克難民，說雪佛龍去伊拉克採油，當地人沒有工作了。所有其他的董事都保持沈默。董事之一的原聯邦參議院武裝事務委員會主席Nunn與基辛格等美國退休官僚今年在《華爾街日報》發表文章呼籲廢除核武器，我在《華爾街日報》發表評論，很想就核能源問題請教他和雪佛龍公司。最後，O' Reilly見事態不妙，在十點鐘打斷發言，說有訴求的人可以留下來繼續與公司的頭腦們對話，宣佈結束股東大會。

我們從會場出來時，公司不願股東們在正門遇到抗議的人士，讓我們開車繞道從旁門出來。我把車停在附近的商店停車場，到正門口與抗議人士交流，看到那幾位印第安和尼日尼亞人士出來與大家聯歡並接受記者採訪。晚上我從網上讀到各媒體的報導，多數都如實地介紹了會場內外的抗議情形。看來，跨國公司的股東大會正成為全球化動盪中越來越重要的戰場。

二〇〇八年五月二十八日 美國聖拉蒙

（上接第 30 頁）

很顯然，這份預算與廣大國民的期望截然相反。它甚至違反了基本憲章，包括《世界人權宣言》和《剛果憲法序言》。

在那些激烈爭論進行的同時，IMF和它在剛果國內的幫兇們已經擬好了一份預算草案。為了確保其在這個重債貧困國的主動權，IMF答應向剛果提供一系列優惠條件。掌握了主動權，IMF才能在這片國土上強加那些深受抗議的政策，比如縮減社會預算，削減對於基礎生產的補助金額，經濟私有化，開放邊關以及那些加劇社會不平等的稅收政策。剛果是當今世界最貧窮的重債國，政府又怎麼可能對這些條件感到滿意呢？

IMF的不平等政策得以實施，因此它抵除了剛果的小小一部份國際債務。而此舉正有效地掩蓋了一個事實：IMF掌握了對於這個重債貧困國的主動權，就是對整個剛果進行了一次大洗劫。以前的獨裁者Mobutu爲了私人利益，同各種各樣的債主簽訂了很多令人憤恨的國際債務，他得到了豐厚的回報，也讓剛果陷入了災難。這筆債務從來沒有讓人民大眾從中獲益過，說實話，這筆可惡的債務本來是不需要償還的。一些國際金融機構（主要包括IMF和世界銀行）以及剛果的政策制訂者們，應該爲這筆債務負責。比如現任參議院主席，同時也是前Mobutu政府的總理Leon Kengo wa Dondo，他應該對剛果人民負責。目前來說，爲了合法免除剛果的外債，依靠社會各界的力量制訂出一份本國債務審核報告，才是唯一的可行方案。



剛果：一個充斥著搶劫和壓迫的國度

米力，圖山特（衛眾譯）

如果你想研究一些複雜的社會觀點，例如國民搶劫國家財富，國家主權喪失，或者是嚴重的國家負債問題，那麼，剛果民主共和國（DRC）就是一個最典型的案例。

剛果2007年度國家預算的編制方案，以及由Antoine Gizenga領導的政府提出的政治方針，明確說明了剛果作為第三世界重債國，其外債已經被廢除，並且其他各種社會運動已經在國內進行了多年。

這份由政府內閣提交給國民議會的2007年度國家預算草案，帶有明顯的（經濟）新自由主義化傾向。其中最明顯的依據是來自於財政部長Athanase Matenda Kyelu的一句話“這些政策都是為了讓剛果更多地得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援助”。我們應該記住，國際貨幣與基金組織乃是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倡導先鋒。但全球最貧困的那些國家對於它的評價，一直都是聲名狼藉。這一切都源於從二十多年前開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這些國家強加了不利於社會發展的貨幣標準，導致他們更深地陷入了貧困之中。

起初，國民議會並未通過這項草案！但在6月14日，國會又通過了增加預算的修正案，事態的迅速發展令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轉變了對其原有的負面看法。財政部長再度發言：“IMF董事會已於週一，也就是2007年6月18日召開了會議，對剛果的整體經濟穩定性發展計畫進行了研究，他們重點關注了國會最近關於2007年度預算議案的進展。2007年度本國的預算收入和支出均已增加了相當數額，所以原有的這份財政預算已不再適合當前的宏觀經濟結構。”為什麼國會的態度發生如此大的轉變，終於真相大白了。接著，聽命於IMF的剛果政府通過干涉參議院，壓制住了民間對於此次事件的極度不滿。這就是一個完完整整的例子，充分展現出剛果政府對於IMF及其債權國是如何言聽計從，簡直就像是奴隸服從主人一樣。

到了6月23日，剛果財政部長給參議院帶去了IMF的口信。據剛果報紙Le Potentiel的報導：“Matenda Kyelu希望參議院能修改2007年度預算草案，從而滿足

來自國際上一些組織或國家的要求，這其中就包括IMF。”這次行動果然效果顯著，在6月29日，參議院“修正”了《剛果國家財政預算》。那麼，到底這份預算草案包含了哪些內容，使得IMF對它如此關注呢？

首先，整個預算的金額其實是很少的：約為24億美元，這個數目僅相當於美國政府在伊拉克所控制領土上每半個月的開銷。在這種條件下，要使一個歷經過兩場殘酷戰爭，350萬人喪生的國家重新發展起來，又怎麼可能辦得到？找一個某些方面與剛果類似的國家來比較，例如擁有6千萬人口的法國，其每年的財政預算高達5200億美元，相當於剛果的200多倍。再來看看剛果，礦產資源豐富，農業土地肥沃，這些條件都比法國要好，而國家經濟卻如此落後，從地質學角度來分析這實在是不合邏輯，簡直就是恥辱！

另一點有趣的比較是：剛果的財政預算剛剛好超過IMF一年的運營開支，而IMF所有的雇員總共只有2千7百人！一個極具諷刺意味的事實是，剛果的國家財富既沒有給這個國家帶來任何利益，也沒讓全國的人民百姓得到任何好處。這些財富全都讓政府的少數親密夥伴以及幾家跨國企業給私吞了，而這些企業的經濟利益，恰好是由IMF和幾個世界大國所代表的。

另外，剛果的財政預算中，有50%的金額被用來償還債務，這完全就是個不均衡不合理的分配比例！而這個比例還在不斷的提高！正如剛果總理在預算草案發佈時所聲稱的：“這份財政預算削弱了政府對於國家資源的操控權。從2007年開始，政府想要改善國家官員以及公務員，尤其是員警和軍隊的工作環境及待遇，或者想要在某些優勢方面加強投資力度，都將變得更加困難。”到底是加強優勢方面的投資力度，還是給那些本來就很富裕還在不停掠奪本國資源的債權國償還債務。最終，迫於IMF的強大壓力，政府只能選擇了後者。

（下續第 29 頁）

厄瓜多爾：一次勝利的進軍 國家聯盟黨的壓倒性勝利

布蘭可 (衛眾譯)

[在最近的厄瓜多爾新制憲國民代表大會選舉中，國家聯盟運動 (Movimiento Alianza País) 和總統拉法爾·葛雷亞的反帝國主義政府贏得壓倒性勝利。]

今日的厄瓜多爾正在進行一場勝利進軍。在此刻正在尋求變化的三個南美反帝政府中，厄瓜多爾政權擁有最廣泛的支持。

玻利維亞在前進，但不幸的是，掌管著四個部的右派已經能夠編列成一隊反對變化的中產階級。

委內瑞拉右翼在一場謊言運動中取得成功：一個公司支持政變，因此它的廣播許可證理應吊銷，但這些謊言反對說，這侵犯公司的“言論自由”。結果該公司得以繼續其營業許可直到執照期滿。

在厄瓜多爾，就如在玻利維亞，總統選舉中的勝利只不過是大規模群眾鬥爭的長期過程裏的成功一步而已。這個過程目睹了順服大公司和美國利益的總統頻繁倒臺，這些總統大肆掠奪他們的國家和加速環境惡化，把國家推入貧困。

前任厄瓜多爾總統爲了獲得統治所需要的支援，一開始就把自己置於一些進步部長的包圍中，這個設置很快就垮臺了。臨時部長中的一位就是拉法爾·葛雷亞，他作爲部長的曇花一現讓人們視他爲有能力領導經濟的人。他於2006年當選爲總統。

人民深爲輕視所謂反應的心臟的議會。他們要求一個制憲大會。葛雷亞不僅許諾召開這樣的大會，還拒絕提出議會候選人，讓選民相信他信守承諾。

選後，葛雷亞宣示效忠使他獲勝的關鍵的本土群眾運動，其做法是來到贊巴瓦的山村接受本土民族的權力杖。許諾他的政府將是“本土政府”，他解釋說，“這不是一個變化的時代，它是各時代的一個變化。”

當然，一旦當選，他就首當其衝，面對著反動議會。議會不僅完全反對召集制憲大會；它甚至有精力爲議員大幅加薪去投票。首場大戰是爲批准一個制憲大會的選舉舉行公民投票。議會當然是鐵定反對，

但最高選舉當局決定推進投票。議員們投票罷免仲裁法庭首席法官。但法官回應說，是議員們應當被罷免，因爲他們爲反對他而觸犯了憲法。

人民圍困議會的大規模示威解決了這個爭論。面臨右派政變的威脅，葛雷亞很幸運，他沒有像阿根廷總統胡安·貝隆和智利總統薩爾瓦多·阿連德過去所做的那樣去阻止人民。葛雷亞反其道行之。他說人民完全有權和平動員，並且這樣的動員是推進必要的改變的唯一保證。

2007年三月，選舉組織當局免除了57名妨礙制憲大會集會的議員。法律許可他們所屬的黨可另選人取代他們。當然，那些不承認議員解職令的黨派命令他們的替代者拒絕赴會。但那只不過是這些圈子裏的出風頭渴望而已，很多替代議員迅速地宣誓就職並且投票贊成就召開制憲大會問題舉行公民投票。不要認爲這是表明現在的議員比他們前任較不反動，較少貪污的一個跡象。

公投於4月15日舉行，百分之八十贊同召開制憲大會，百分之十的反對票和百分之十的廢票。

制憲大會選舉將於九月三十日舉行。據我看，這個大會將不會有其玻利維亞同行所經受的艱難歷程。它將會是人民的巨大勝利，從中將會出現與現在迥然不同的憲法，目前的憲法服務於剝削國家和置其人民於貧困中。新憲法是一個工具，它讓厄瓜多爾人民在尊重環境的準則下按照大眾的利益管理他們的國家。

戰鬥當然不會結束。自由的里程是漫長的。厄瓜多爾人民已經控制了政府，但他們還沒有力量，那些力量還在大公司的手中。制憲大會選舉將是這場鬥爭中的重要一步。

祝賀你，厄瓜多爾的弟兄姐妹們！

雨果·布蘭可是1960年代早期秘魯庫茲可地區農民起義領袖，1978-1980秘魯革命左派聯合和更新的象徵，遭受過監禁，死亡威脅，流放，後因國際一致的壓力而釋放。

(本文發表於十月號《社會主義之聲》)

厄瓜多爾：葛雷亞政府和新制憲大會面臨的挑戰

圖山特（衛眾譯）

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裏，拉法爾·葛雷亞贏得了四場選戰(2006年底的兩輪總統選舉，2007年四月就是否舉行制憲大會選舉而作的公民投票，2007年九月三十日的制憲大會成員的選舉)。

當所有右翼黨派竭力阻擋拉法爾·葛雷亞的黨，稱它為一個共產主義威脅時，‘國家聯盟黨’從130個席位裏贏得了70到80席，那意味著它能以穩當的大多數草擬新憲法並給它投票。況且它還能依賴像人民民主運動(MPD)和帕恰庫蒂克運動(Pachakutik)這樣的左翼運動把深層的民主變化引入國家政治結構裏。制憲大會的選舉結果比玻利維亞那兒的情形更有利於改變，在玻利維亞，埃沃·莫拉萊斯總統的黨和支持運動沒有達到投票通過新憲法必須的三分之二的席位。這也許能解釋另外這個安迪斯國家的目前的政治死結。

甚至大媒體，其中絕大多數在競選時期明顯地站在反拉法爾·葛雷亞一邊，現在似乎要準備改變行動方針。它們所支持的黨派被如此壓倒性地否定以至於他們（至少暫時的）調低了反對總統和其政黨的攻擊聲音。確實，右翼和中右黨派（基督教民主黨 - UDC，社會民主黨 - ID）完全被粉碎。香蕉企業界大亨阿爾瓦若·諾玻阿的黨PRIAN，在去年第二輪總統投票中被拉法爾·葛雷亞挫敗，它不會獲得多於5%的制憲會議的席位。右翼的傳統台柱社會基督教黨完全潰敗。前總統盧梭·古鐵雷斯只弄到了15到18個席位。這讓他們吃驚，因為民調預測葛雷亞支持的候選人的得票適中。媒體謹慎的演變終究有限，他們給拉法爾·葛雷亞和其黨的領袖人物非常少的廣播時間。總統每週六作無線電講演。各種私人和社區無線電實況播送他的講演。一個公共電臺和電視頻道將在數周時間裏開播。

幾天以前我見到了阿爾伯托·阿庫斯塔，他說新制憲成員面臨非常困難的日程表。他們要在六個月內草擬一部新憲法。45天後就草案舉行全民公投。

2007年最後一個月和2008年充滿民主投票：關於憲法內容的公投，非常可能的新議會選舉和新總統選舉。的確，據說拉法爾·葛雷亞想把他的總統任期提前結束（離2010底任期正常結束的時間還很長），以便進一步扶助他的大眾支持和開始新憲法條款下的一個任期。如果這個方案得以實行，如果厄瓜多爾的民主沒有被軍事政變窒息，到2008年底，厄瓜多爾可能會有一部新的民主憲法，一個新議會（可以預期，與現在的情況不同，葛雷亞的黨在議會裏會有多數席位）和一位新當選的總統。這將開啓一條導向深遠的經濟社會變革的道路。

銷債運動[1]前領導人之一，經濟學家阿爾伯托·阿庫斯塔可能主持新制憲大會。他將建議他們工作在議題委員會和全體大會。關於目前的公共債務，他傾向於邀請內外國債綜合審計委員會（西班牙的CAIC）參加制憲大會經濟委員會的會議。新憲法可以包括一個關於條件的清楚定義，在這些條件下，許可全國政府和地區當局緊縮公共債務，以及拒絕履行惡劣的債務和固定可用於償還債務的最大限量。例如，憲法可以規定，國家預算裏還債的部分不能超過分配給教育和健康的部分。

2007年9月30日選舉勝利後的幾天，拉法爾·葛雷亞政府宣佈在國內運作的石油公司必須將其利潤的較大份額付給國家。這應該帶給國家十億多一點的額外收入，這筆錢可用於社會開支。

這個措施受到民眾的高度評價。還有，拉法爾·葛雷亞政府希望銀行降低利率，現在的利率非常高。幾個月之前，仍是右翼多數的議會，投票反對降低利率的法案。議會已經變得極不大眾化。9月30日後所做的調查顯示，多數選民贊成現在的議會辭職並由制憲大會取而代之。

民眾對拉法爾·葛雷亞期望很多。他激情的演講已經說服了大多數厄瓜多爾人，即如果總統獲得顯著的多數，那麼一個根本變化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

拉法爾·葛雷亞總統尋求顯著減少預算中用於償付國債的份額。同時，他希望增加社會支出。2008年他確實會擱置某些債務的償還嗎？他會拒付這個國家負擔的許多惡劣而不合理的債務嗎？[2] 這並不是完全確定的，理由有幾點。主要一點是，隨著較高的石油稅收，政府會認為逐步增加社會支出的同時還能償還債務。如上所述，為了執行這個政策，它已經提高了石油公司將付給國家的稅收份額，並決定借用內外市場以重組舊債。後面的政策難以是明智的，因為它沒有考慮厄瓜多爾和大多數發展中國家裏隱約可見的危險，比如說利率的提高(新貸款的一大半，其銀行實行變動利率)和油或其他原材料市場價格的下跌。或許債務綜合審計委員會(CAIC)能夠清楚辨認出惡劣和非法債務。那麼政府仍舊會償還那些債務以避免債主的國際壓力，以及避免同掌握大部分國家經濟的大私人企業的緊張關係嗎？這個基本的爭論將會發生在2008年。拉法爾·葛雷亞會選擇公平而又具有主權的解決之路對付非法債務嗎？我們希望如此但不能確定。

在拉丁美洲區域整合的水平上創建南方銀行，這件事2007年已宣佈，已經因為巴西方面的沈默而延期。儘管如此，2007年十月九日和十日在里約熱內盧舉行了一個重要的部長級會議，會議期間一系列障礙被消除。不管巴西和阿根廷試圖撤回一國一票裁決制（批准於2007年5-6月）和厄瓜多爾推進它，看來會議最後在民主裁決原則上達成一致。南方銀行的總部將建在加拉加斯，順利的情況下2007年十一月三日應出現在委內瑞拉首都。

社會變革之路充滿陷阱。在過去的幾年，拉丁美洲有一些右翼總統獲選，他們是通過許諾同其前任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割裂而當選的，但是他們之中很少人真正信守諾言。讓我們希望拉法爾·葛雷亞持守其道而且成功地以民主政策執行社會正義。目前他的戰略已經增加和安慰了民眾對變革的支持。它已經為制度的民主改革設置了必要條件。進一步加強了國家對於美國的獨立性，同時加強了拉丁美洲的整合。這已經很可觀了。

必須密切關注厄瓜多爾形勢。2007年10月19日

星期五和20日星期六，CADTM（免除第三世界債務委員會）在布魯塞爾高興地迎接裏查多·帕蒂諾部長率領的厄瓜多爾代表團，裏查多·帕蒂諾部長負責審計債務和南方銀行的創建。星期五和星期六，代表團將在比利時參議院會議廳就債務審計作發言（見議程）。星期五晚間（8：00）在傑克·布熱爾青年招待所將有個講演，題目是“拉法爾·葛雷亞政府和新制憲大會面臨的挑戰。”

（《國際觀點》第393期，2007年10月號）

注釋

圖山特是“免除第三世界債務委員會”(CADTM)主席。

[1] 阿爾伯托·阿庫斯塔已經出版了債務方面的幾本書和一百多篇論文。2003年，他出席了CADTM在布魯塞爾舉辦的研討會，討論拉丁美洲現在的變化。

[2] 參見‘債務犯罪’（‘Les Crimes de la dette’（CADTM-Syllepse，Liège-Paris，2007））中關於厄瓜多爾債務的章節“十字路口的厄瓜多爾”。文章也在www.cadtm.org上。它已經被翻譯成西班牙語，英語（見<http://www.cadtm.org/spip.php?article2767>）和日語



委內瑞拉的查韋斯：社會主義仍是我們的目標

富恩特斯（衛眾譯）



差距極小的失敗，這一結果讓雙方都感到意外。已連續獲得了11個選舉勝利的驕傲的查韋斯陣營陷入困境。美國支持的親資本主義反對派則被迫想出一個新的策略，因為在查韋斯總統欣然接受失敗後，其精心策劃的破壞穩定運動的下一步不得不推遲施行，這個下一步就是上街抗議預先假定的選舉舞弊。

"現在，我們不能這樣做！" 查韋斯在他的敗北演說中解釋說。

當新委內瑞拉聯合社會主義黨的隊伍——查韋斯創辦的，旨在團結轉變過程的基層領導的組織——會集彙報時，討論和辯論爆發了。國營電視臺主辦了更廣泛的討論。像aporrea.org那樣的左翼網站被各種意見淹沒。

新年前夕查韋斯給出了他未來行動的第一個跡象，公佈了一項法令，特赦400人，這些人在2002年4月反對查韋斯的右翼軍事政變中簽訂了臭名昭著的"卡莫納法令"，解散所有公共權力。

幾天後，在國家電視臺演講時，他指出："我們需要改進我們的聯盟策略。我們不能讓自己被極端思潮拖著走...。不！我們必須尋求同中產階層結盟，甚至還要聯合民族資產階級"。

1月6日，查韋斯在他當年的第一次"哈囉，總統"電視節目上解釋說："我不得不放慢前進的步伐。我一直強行的速度，超過了整體的能力或可能性；我

同意這一點，這是我的一個錯誤"。

社會主義倒轉頭？

"社會主義倒轉頭"就是斯蒂芬妮·布蘭肯貝格在1月8日的"新政治家"上所描述的那樣。查韋斯"已決定'現在'放棄他的社會主義議程"，因為該國"對他的社會主義計畫"沒有"準備"好。

還有，布蘭肯貝格辯稱，12月2日的投票"本質上是'查韋斯街頭份子'抗議'查韋斯精英份子'的投票。查韋斯的"轉向'右翼'的戰略"——她認為，該戰略給了"'查韋斯精英份子'一個無限制的權利"——"不可能激起基本群眾對[他的支持]"。

英國社會主義工人黨中央領導人阿樂克思·卡林尼可在1月19日的"社會主義工人"雜誌上寫道，這些舉動"令人警惕"和"危險地讓人想起"左翼智利總統薩爾瓦多·阿連德1973年的作為，當時右翼準備用暴力推翻他，讓奧古斯托·皮諾切特將軍掌權，而他則"尋求同右翼打交道"。

卡林尼可寫道，查韋斯的轉變是因為認識到人民對糧食短缺，通貨膨脹和腐敗問題的不滿，但卡林尼可認為處理這些問題不應"減慢革命進程，而是加速它——打破私人資本對經濟的控制。"

只有拆除現有的國家機器，代之以大眾的權力體制，腐敗才能根除。但查韋斯卻朝相反的方向行進。

然而，對查韋斯策略變化的這一分析有多準確呢？

自我批評

很顯然，查韋斯總統已經認真聽取了對其政府的廣泛批評，以便擬訂自己的回應。他對形勢最完整的聲明，是他1月11日對國民議會的演講。

他指出了革命所面臨的一些問題：合作媒體的權重和缺乏對付它的方案；犯罪；糧食短缺；特別是官僚主義，效率低下和貪污腐敗的惡瘤。

後者導致了2007年社會任務——它們代表了面

向大多數窮人的重要成果——的弱化，特別是社區醫療服務隊（Mission Barrio Adentro）和平價食物分配任務（Mission Mercal）的弱化。

查韋斯提出說，"已經傷害人民的信心…… 每天從地方政府發出和我主持的國家政府一樣多的某類廣告宣傳；騙人的宣傳，蠱惑人心的宣傳，多次同人民生活現狀相衝突……"。

問題的部分原因是展現誇張的數字以誇大所取得的成就。

舉例來說，在2007年年底，政府宣稱有30000公共議會機構（群眾力量的草根機體），但今年初該數字修訂為18000。要在一年內達到建立50000議會機構的既定目標，這個企圖導致許多問題，因為只顧一味力推進程，而忽略了著眼於確保議會機構正確的形成，其步調適合人民的能力，以確保它們能恰當地發揮作用。

委內瑞拉聯合社會主義黨有類似的問題 -- 去年，該黨簽下了5.7百萬人，在某些省，列表上加入的人比上次大選中投查韋斯票的人還多。官方公佈的持續參加委內瑞拉聯合社會主義黨組織的數字為1.5百萬，這顯然是誇大的並可能至少是真實數字的兩倍。

查韋斯指出，"領導人的話語和管理不善的現實或惡劣的政治做法之間的矛盾……革命需要加強人民的信心……我們必須同時說服和表明。"

查韋斯堅持說："我要宣佈今年為'革命衝擊'年，今年必須是解決人民各種具體小問題的一年"。

這部分是真的，正如布蘭肯貝格論述的，公投失敗的一個因素，是為抗議各級政府的管理不善而投的反對票。

此外，有一點是毫無疑問的，即部分的查韋斯陣營和國家官僚機構，由於其特權受到社會主義推進行動的威脅而破壞運動。否則，你如何解釋這個事實，即像糧食短缺這樣的問題，可以持續數個月，而政府或國家機構沒有採取認真行動對付它？

這表明，一方面人民的信心已經遭到破壞，另一方面查韋斯陣營內部存在嚴重的政治弱點，在這種情況下，不要試圖迅速深化該社會主義進程，正確的做法是首先克服這兩個問題，為必要的有意義的進展打

下基礎。

這似乎是查韋斯為2008年設立的計畫的本質。

戰略性錯誤

查韋斯所說的並承擔全部責任的戰略錯誤是 "不是發動新進攻的時刻……我們需要有聯合，我們需要起動，和重新起動政府的各個方案，尋求更高的效率……"。

查韋斯形容公投失敗，就像一個拳擊手要出拳，但沒有擊出。拳擊手的雙腳原地不動。革命沒有進步，但也沒有倒退。

重申"解放我們家園的唯一而真正的道路是社會主義道路，" 查韋斯說："我呼籲大家，使這一年得到更多的進步"。

查韋斯已制定計劃，用以彌補他與人民之間產生的間溝，這種間隔導致他喪失了近300萬在總統選舉中支持他的選民，那些人在全民公決中棄權。計畫目的是要找到辦法，把解決人民大眾面臨的問題同提高組織和覺悟水平相結合。

這樣做將不可避免地使這一進程陷入同資本主義利益的衝突中，一如它已經遇到的情形。然而，這並不意味著要工人階級在沒有必要準備的情況下被迫進行決戰。

新內閣

並不是給"查韋斯精英" 無限制的自由範圍，查韋斯在他最近的內閣改組中發出了一個明確的訊息：閣員們必須有效率。

最明顯的例子，就是一個新的副總統，拉蒙·卡裏紮爾，他的出名是因為這個事實，即去年他作為住房部長，這一年所建的房屋比查韋斯政府以往任何一年所建的都多。

他是基礎設施部部長時，成功地主導重建連接加拉加斯和國際機場的重要橋樑，工程在創紀錄的時間裏完成，他也因此出名。

在一個跡象，表明內閣改組並不代表一個根本的政治轉向，被認為是激進的前副總統喬爾赫·羅德里格斯，他已經有空集中全力全時間專注委內瑞拉聯合社會主義黨PSUV ——把革命推向前進的關鍵政治

工具。

在1月13日的‘哈囉總統’電視節目上，幾位部長因為項目進展不夠快而收到炮轟，這是傳給他們和人民的進一步信號，即政府的意願是真正的變革。

呼籲尋求與中產階層反對派支持者和民族資本家達成協定，部分原因是窮人中間有一個共同的抱怨，即查韋斯的言辭常常過於含有對抗性而且有引起不必要衝突的危險。

特赦一些政變參與者就是為了回應由反對黨圍繞所謂“政治犯”發動的運動，特赦並不包括刑事犯或那些逃離該國躲避責任的人——換句話說關鍵的政變領導人被排除在特赦之外。這樣，查韋斯已經削弱反對派運動——讓他們保護那些不能得到保護的人。

民眾權力和政治組織

在同一講話中，查韋斯提到結盟民族資產階級，

他還呼籲人們閱讀弗·列寧，強調說，首要的中心任務是，必須深化人民的社會和政治組織——主要是通過公共議會和委內瑞拉聯合社會主義黨PSUV。

把公共權力的推廣作為中心任務，查韋斯說：“公共議會這個問題不能局限於資源轉讓……最為重要的是你組織自己，有社會鬥爭的意識，在團結社區中前進……”

“為了使12月2日永遠不會再發生，”1月12日，在委內瑞拉聯合社會主義黨成立大會上的開幕演講時，查韋斯說，有必要以委內瑞拉聯合社會主義黨作為革命的“矛頭和先鋒”去進攻。“我們已經到了進行一場真正的革命，或消亡於嘗試的地步”。

2008年1月21日 綠色左派週刊

（衛眾譯）

委內瑞拉：處於帝國主義、憲政改革和社會主義十字路口的玻利瓦爾革命

博爾赫斯 加西亞 偉瓦斯（衛眾譯）

革命進程內部的緊張、鬥爭、辯論和矛盾在加深。一方面，在RCTV[1]未獲得牌照續約後，親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試圖走上街頭，但這一次碰了一鼻子灰，目前在反對憲法改革和“穩定工作”新法律的框架內，正準備新的行動。另一方面，工人運動的各團體施壓，以便在集體談判協議上獲得改善，並迫使政府以及工會的官僚不按他們的立場做決定。石油工人和公共部門雇員的情形尤其這樣，正在繼續爭取獲得合適的住房和更好的社會服務的貧困人口的各團體，其情形也是如此。“現在，我們不能這樣做！”查韋斯在他的敗北演說中解釋說。

所有這些人引起了國家官僚日益嚴重的關注，國家官僚正在鞏固並增加其權力和特權。在查韋斯方面，他已經宣佈了一些使資產階級焦慮不安的新方

案，但同時申明委內瑞拉聯合社會主義黨（PSUV）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政黨，並表示工人階級不是革命動力，從而削弱左翼方案以便保持同資產階級各團體的聯繫。所有這些激動都會折射在群眾組織和委內瑞拉聯合社會主義黨（PSUV）中，在那裏，與基層戰士合作，同那些想抹殺其組織方法和民主特性的人碰撞的同時，我們的階級鬥爭主流保護其立場。

委內瑞拉經濟繼續取得進展，增長速度超過百分之九，外匯儲量超過350億美元，稅收增加，而且石油價格在其最好水平，高於每桶50美元。在此框架內，2008年1月貨幣改革——強勢博利瓦——已準備就緒。但一如過去一年的情況，這種良好的經濟形勢並沒有阻止嚴重影響各大眾團體日常生活的通脹。今年年底，它很有可能會達到近15%，但職工的整體實際

收入並沒有按這個比例增加。而最糟糕的是，食品的短缺趨於惡化。在同一時間，各社會建設方案在繼續發展，但他們仍然沒有去設法解決重大社會問題。尤其是，社會保障法至今仍未得到落實。我們正在觀看第一批所謂社會主義企業的建立，注視著維拉紐瓦計畫，該計畫涉及一些通過領土重組計畫而處於憲政改革框架內的新市鎮。

國有化進程，儘管未能免除問題和衝突，但讓國家能夠加強對電力，電訊網路和石油工業的關鍵部門，特別是奧里諾科石油帶(the Orinoco Belt)等一些戰略部門的控制。在電力和電話的各部門，新智囊團及新的發展計畫正由國家機構設立，而不是基於這些部門職工的民主辯論，讓他們能夠行使其控制作用和發展他們的決策權。在石油部門，儘管國家持有大股，不同的多國公司繼續在挪用我們一部分財富，而國家石油公司PDVSA [2]的內部結構再生出前述行政當局的瑕疵。同大石油公司一樣，那些結構的效率也低於它們以前的水平。

國家最近經歷了巨大的政治和社會緊張，在未來幾個月內可能會繼續處在類似的形式中。帝國主義和大資產階級會施加壓力，儘量避免新的措施和法律影響到他們的利益，而這時候玻利瓦爾群眾正在對抗一個崛起的國家官僚機構以尋求解決其嚴重的社會問題。

資產階級和官僚主義：

"不是因為友愛而是由於恐怖才聯合"

一個玻利瓦爾官僚主義的發展 - 官僚主義從它在國家機器的位置開始，破壞革命進程的基礎，與同政府就信用問題作談判的玻利瓦爾新資產階級維護日益密切的聯繫——是一個重要的、不可闕割的事實。國家結構的官僚主義可能是最大的危險，威脅現階段的玻利瓦爾革命。這個部門所作所為有如與革命無關的利益傳輸帶，腐化和削弱支持革命過程的各界群眾。

正像海曼·爾·特若地在其新書[3]裏準確定義的，反革命經歷了突變。它的新衣裝是一個不含社會主義的查韋斯主義，"意即放慢社會的結構性變革，掩蓋不平等，維護完整的階級特權(...) 這股反革命趨勢

的主要代言人是滲透到革命過程裏的雇傭軍，他們用腐敗和政治控制，否定民眾參與公共事務這些紡紗編織其明顯的陰謀。他們的根本願望：以反對玻利瓦爾革命的叛逆計畫為手段，設立一個新的寡頭政治階層並奪取政權"。

這個描述同相當多同胞的感覺和受苦一致相應，顯示在同一時間這兩個團體之間的必然聯合，這兩者是同樣危險的，現在相互依存：資產階級需要國家的官僚階層，以便繼續經營並發展，使危害其階級利益的措施得以緩行；官僚階層需要資產階級，以便保持其特權和其權力領域，同時發展其本身的事業。目前，我們可以看到，巴內斯科和卡那裏阿銀行，和其他銀行家，比如維克托·吉爾，易諾思肯，塞德尼奧，拉斐爾·薩里阿和佩特日卡，正在發展世紀的商業交易。這些高利貸者在與政府中的什麼人談判並締結協定？他們需要對方，他們是相輔相成的，而且他們都害怕普通勞動者和民眾動員。按照豪爾赫·路易士·博爾赫斯的意思說，[4]連接資產階級和官僚主義的不是友愛而是恐懼，他們所面臨的恐懼，同革命中間的底層運動和反資本主義措施的進展有關。解雇和修理政府機構內部高聲說話者，在今天的PSUV內部，如果有人欲運用侍從庇護關係方法以維護其權力領域，這些人也要被解雇和修理，這些命令以及從事鬥爭團體的批評，控制社會團體的企圖，它們來自兩個方面，這不是偶然的巧合。

面對這些帝國主義的攻擊和官僚體系日益增加的權重，數以百萬計的委內瑞拉人都疑惑查韋斯在想什麼，他會做什麼。他是否意識到了存在於他周圍的嚴重問題？在政府高層，玻利瓦爾權利的包裝會保持到什麼時候呢？在我們看來，他清楚一切，例如去年7月22日，在第一次 "1月23日城鎮化大軍" 會議上，他是這樣談論他周圍人員的："像是捲曲的蛇，他們正在玩沒有查韋斯的查韋斯主義，把查韋斯撇開；不過，只有我們的上主，或你們人民的聲音，才能將我孤立。" [5]。

關於憲政改革的辯論

當查韋斯談論社會主義和終結資本主義時，他吸引了大多數人的所有同情。當他發表反對工人階級和

馬克思主義的言論時，他增加了革命進程中各團體的疑慮和分歧。當查韋斯號召PSUV內部的人們從下往上組織起來，他引生了希望。當他公開支持迪奧斯達多·卡韋略-玻利瓦爾右翼主要發言人 - 他迷惑和削弱了革命的最堅定階層。我們捍衛了查韋斯，反對一切帝國主義進攻，而且只要面對帝國他仍堅持自己的政治獨立，我們將繼續這樣做。但是，如果我們希望向前邁進，或者正如他所說的，我們正處於一個向預設的社會主義國家模式過渡的時刻，用西蒙·羅德里格斯的話[6]，那就是意味著 "政治革命強行要求經濟革命"。這個經濟革命要體現在具體措施上，但這些措施至今仍未落實。

8月14日，查韋斯向國民議會提交了其憲政改革的計畫。正如已經宣佈的，這個計畫涉及一些重要問題，如民眾權力，工作時間的長短，新的行政權力和聯邦領土，無限期地當選為共和國總統的可能和各種形式的財產。

關於法定工作時間的長短這個問題，玻利瓦爾共和國聯邦憲法第90條的修改將代表一個進步，它規定："為了讓工人有足夠的個人全面發展的時間，白天工作時間將不超過每天6小時每週36小時，晚上工作的時間在將不超過每天6小時每週34小時"。這條法律的生效，需要職工們組織和動員起來以保障其實施。有關民眾的權利，對憲法第136條的修改建議說："民眾通過社區會議，職工會，農民會議，學生會議及其他法律實體建構社區鄉鎮和市自治政府以展現其權利。" 這方面完全值得廣泛討論。在改革中處理這個問題是積極的，但同時有必要避免甚至抗爭任何這種傾向，即控制這些作為民意機構的會議的權利和主導作用。

建議"總統任期增加至7年，並允許立即再次當選這一職務"。重要的事情並不是這樣的一個可能性，而是這些變化使得有可能走向一個更民主的制度，使工人和人民團體的權力法制化，估計在新一屆議會中他們有過半數的代表，擴大了通過投票立即罷免各部門職權的可能性，在各個層次的政治和經濟決策上維護人民表達自己意見和決定的權利。

最後，關於財產模式，該改革計畫把包括私有公

司在內的五種類型合法化。

事實是，在一個仍然是矛盾的框架內，各個資產階級團體都在憂慮擔心。對於律師和代表資產階級的阿司都巴爾·阿吉亞爾而言，"國家為自己保留私人經濟活動的規劃。對它們來說，私營企業是社會主義生產模式的附屬並且作為一個許可證持有者經營業務。這伴隨著一個關於工作角色的大矛盾，那是由改革計畫的第113條揭示的：政府處罰不服從生產方法的私人"。[7] 費得可馬拉斯[8]和其他聲音也質疑工作穩定的新法律。他們擔心，國家將限制私人公司解雇職工的可能性，就像上層資產階級的一家主要報紙解釋的那樣："這個法律工具會導致對雇主裁員權利的限制（……）。雇主將必須請求獲得工廠檢查員所代表的公共權力的許可"。[9]

規劃與發展群眾力量部部長豪爾·赫希奧爾達尼向我們保證，"私營公司的角色可以完美地共存於社會主義制度框架內，只要其結局不同這個公司所屬的社會安康相衝突" [10]。事實上這種選擇是烏托邦的 - 因為私人資本的運轉從來都不是按社會福利，而是根據剝削利潤決定的 - 除了這個事實外，它還削弱真正的社會主義計畫。未經銀行國有化，不用社會財產更換私有的生產資料財產，沒有人民組織的力量優勢，將無法向社會主義國家推進。

這一向私人資本開放的社會主義構想遠不是新的，或者-如其所稱-"委內瑞拉式"的，它已投入實踐，帶有痛苦的結果。最新的例子是中國 - 雖然革命後這個國家就開始掌握全部生產資料。用"中國式的社會主義"的類似話語，中央政府推出了一個市場改革和分三個階段開放私人資本的過程，帶來苦難和超級剝削的災難性後果。正如兩個公認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的解釋，聯繫到80年代私人資本的進入，"雖然最初依靠國營部門，城鎮集體企業是獲利的，其中許多企業實際上是私人公司，它們抹上紅色以便取得供應和信貸的納稅利益(...) 改革過程的每一個新階段產生新的緊張關係和矛盾，只能通過擴大市場權力來解決，從而導致資本主義政治經濟日益鞏固。因此，不是像改革派斷定的那樣，利用資本主義來建設社會主義，不可避免要發生的和實際發生的事是：市場社會主義用社

會主義建設資本主義(...) 這一改革過程突出了一個事實，即一旦你開始踏上市場改革的斜坡，你只能繼續下滑”。[11]

委內瑞拉起步的情況不同，它已經從古典資本主義走向市場的混亂和動盪，每一個改革使局勢更加緊張。如果我們不採取進一步行動，如果在社會主義話語背後，我們維持資本對生產資料的權力和私人金融體系，那麼長遠來說，不是打破資本主義模式，反而是保持它，甚至強化它。其風險是：並非向新事物進步，而是我們在重複20世紀假社會主義的最壞模型之一的最壞錯誤。

另一種爲了證明與民營企業共存合理化的說法是：必須打破教條主義。大家都知道，任何被推到反常地步的真理就不再是真理。並非有一個教條式的方法是一件好事，但是，這並不意味著拒絕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政治基礎，如果他們仍然符合世界和委內瑞拉現實的話。今天，不論在何處去看，私人資本就是剝削和個人利潤的同義語。洛倫索·門多薩（極地企業），古斯塔沃·西斯內羅斯（西斯內羅斯集團），卡普里萊斯家族（連鎖卡普里萊斯）或所羅門（sambil），恩撲熱文的老闆們和非德庫馬拉思新領導層（曼紐爾·岡薩雷斯，諾埃爾和阿爾瓦雷斯和斯諾·加西亞）根本沒有參與任何社會主義項目，政府卻已經和上述這些人達成協議或正在這樣做。我們建議，憲法要明確地訂立所應遵循的方向是逐步消除經濟和工業金融體系所有制模式中的資本主義權利。

憲政改革辯論正在緊張的氣氛中進行，明顯受到大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的反對。然而大資產階級擔心，如果它採取新的行動，街頭動員起來的人民和職工可能迫使查韋斯更加激進。有關事項對憲政改革辯論太重要了，以至於它不能只限于知名人士委員會裏或國民議會的圈子內。它必定是一個全民的辯論，連帶他們組織的，群眾性的制憲辯論，其中普通老百姓討論憲法需要作出的改變，使它指向社會主義道路並讓工人和人民的決策權合法化。

工人和人民組織，革命的優先事務

一個基層的組織過程正繼續在各個領域得到發展。在工會，農民，大眾，土著水平上，在土地，住

房或水資源委員會內部，在另類媒體裏，到處都維持著群眾的積極參與。正是這種革命的摩托力量必須鞏固和發展。如果有人想要消除自主權和批評，我們必須一致鬥爭反對該過程裏的任何獨裁傾向以避免這種情況。

在工會運動內部，這個現實是由‘階級鬥爭統一革命和自治運動’（CCURA）的發展所表達的，[12]CCURA的發展仍然是我們第一優先的工作。在同其他運動潮流達成的，保護全國工人聯盟（UNT）和推動內部選舉過程的協議框架內，今天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有必要維護它的結構和運作。在CCURA內部，它的一個大部門已經在委內瑞拉聯合社會主義黨（PSUV）註冊而另一部門沒有，越過這個事實，在革命和深化革命需要的框架下，允許所有政治經驗的自由發展，[13] 必須優先考慮的是統一和相對於國家和黨派的獨立。

有一些基層組織處於前列的重要鬥爭，值得我們全力的支持。在石油部門，CCURA正同勞動部和玻利瓦爾工會力量（FSBT）的計畫衝突，後者要把其權力同國家官僚機構結合，它提出的集體談判協議沒有工人的參與，並且蔑視他們的意見。同樣的事情正發生在公共部門雇員的身上，對於運輸部門，他們有一個的類似方案。正在作其他鬥爭的有：組織起來的漁民和圭裏亞港口社區，拒絕在他們祖先的基地上安裝天然氣管道的瓦餘（Wayú）土著人，爭取適當住房的社區以及呼籲迅速考慮其要求的農民。根據新的理論，沒有必要去爭取需求，因為我們正走向社會主義，離接受該理論尚遠，我們正在支持和發展這些鬥爭。工人和人民的直接需要組成一個權利，如果我們正走向社會主義，它必須是倍加尊重的。

在該基層組織過程的框架內，公共議會繼續發展下去，但並非沒有矛盾。卡羅拉（Carora）無疑是最好的例子，那裏百分之百的公用預算由議會依據其估計出的需要而討論並決定。這是一條應當在全國都遵循的道路。在工人運動裏，工人議會的形成功能問題尚在辯論中。不幸的是，政府和工會運動(FSBT)的某些單位的目標是一個受控制和反工會的模式。這並不妨礙階級鬥爭戰士提出自己的工人議會模型：民主，

統一，同民主與合法的工會一致行動，爭取工人的企業權利。關於議會的辯論，無論他們是公眾的，工人的或學生的，都必須由基層進行和決定。以便使他們不失去動力以及權力去提出需求，並推動那些形成革命基礎的人們的鬥爭，有必要採取行動，保護他們不受害於一些這樣的方案，這些方案的目標是把他們捆綁到國家的和對付他們的公務員的決定上。

委內瑞拉聯合社會主義黨（PSUV）

——觀點與挑戰

委內瑞拉聯合社會主義黨目前正在舉行首次各基層單位會議，籌備它的第一次代表大會。我們已經看到，近幾個月來，各政府部門竭盡全力，試圖控制整個過程。但在同一時間內，基層的實力和願望，已開始說服許多社會主義陣營的會議。[14]毫無疑問，一場嚴重對抗正在到來。正如報紙 *Las Verdades de Miguel* 寫的，"在委內瑞拉聯合社會主義黨內部，將發生革命過程的左翼和右翼之間的鐵路碰撞"。

作為革命家，我們不會置身於這場鬥爭的邊緣中，這場鬥爭將決定國家今後幾個月和幾年將要遵循的政治過程。我們積極參與了每一個會議，提出我們的建議，聽取基層的聲音，並同所有忠實的團體一致行動。同希望有一個反資本主義的發展和捍衛民主類型的政黨的那些人彙聚，摒棄官僚作風，專制的運作或軍事結構。革命需要一個基層的黨，它配備了一個結束委內瑞拉資本主義的方案，一個團結所有非剝削階層的、由工人領導的，以便能夠決定自己未來的黨。

CCURA運動與‘社會主義與階級潮流’報的組織者行走的是深化革命，對抗帝國主義和資產階級，反對所有阻礙革命的官僚階級的道路。我們邀請所有鬥爭的社會主義者，和PSUV全體成員與我們一起準備出現在地平線上的大鬥爭。"教育自己，因為我們需要充分發揮我們的智慧，積極參與，因為我們需要充分發揮我們的積極性，組織自己，因為我們需要充分發揮我們的力量"，葛蘭西說。正在這些需求的服務裏，一個社會主義的目標形成，圍繞著‘社會主義與階級潮流’報，一個參與，意見和經驗交流以及互相彌合的空間，開放給所有想要加入的人。

注釋

這篇文章原本刊登在'美洲評論' No.2，2007年8月。

博爾赫斯是委內瑞拉革命和社會主義黨和UNT的領導人。像這篇文章的其他作者一樣，他參加了委內瑞拉聯合社會主義黨(PSUV)。

加西亞（阿根廷社會主義組織MST的會員，居住在委內瑞拉）

威瓦斯（工會主義者，全國工人聯盟的地區協調員），幫助組織全國工人聯盟的‘階級鬥爭統一革命和自治運動’（CCURA），是革命和社會主義黨(PRS)成員，選擇參加委內瑞拉聯合社會主義黨(PSUV)，並出版‘社會主義與階級潮流’報。

[1] 電視頻道RCTV是反查韋斯的流產軍事政變的諮詢頻道。2002年4月，革命進程內部的緊張，鬥爭，辯論和矛盾在加深。政變失敗後，沒有採取任何措施打擊它，而且它仍然散發它的反動宣傳。其牌照在2007年期滿後，沒有被更新。反查韋斯的右翼試圖抓住這一決定動員起來對抗"獨裁"，但未獲成功。然而RCTV繼續通過電纜播出。

[2] PDVSA是國家石油公司，其原管理層試圖阻止2002年12月石油生產（關於這個題目，見愛德華·狄阿可："石油的詛咒"，國際觀點 353期，2003年9月）。

[3] 海曼·厄爾·特如地，（"作一個資本主義者並不是一個好的交易"）。

[4]豪爾赫·路易士·博爾赫斯（1899至1986年），阿根廷作家和詩人，被認為是拉美魔幻現實主義流派的創始人之一（連同加布裏埃爾·加西亞·莫奎茲）。

[5]2007年7月22日播出的節目"哈囉，總統"。

[6]西蒙·羅德里格斯（1769年至1854年）是西蒙·玻利瓦爾的教師和指導。他在教育領域的思想連帶玻利瓦爾和阿則奎爾·薩莫拉的理念構成，隨著思路的，玻利瓦爾革命的"三個思想根源樹"。

[7]普遍的厄爾，2007年7月16日。

[8] fedecámaras是委內瑞拉的雇主組織。

[9]普遍的厄爾，2007年7月30日。

[10] www.aporrea.org，2007年7月23日。

[11]馬丁·哈特-藍茨伯格和大衛·伯克特，中國與社會主義：市場改革和階級鬥爭，每月評論新聞，紐約，2005

年。

[12] '階級鬥爭統一革命和自治運動' (CCURA)，在新工會聯合會UNT（全國職工總會）的基層是多數，但不包括其初創時期建立的臨時領導體制。為此 FSBT（玻利瓦爾工人工會力量），受到勞動部，以及大體上的政府官僚層的支持，到現在為止已經試用了所有手段，以防止舉行內部選舉，該選舉通過選擇代表領導層，將確定新聯盟的存在及合法性。今年7月，為了推出這項選舉進程，CCURA與全國職工總會的其他四個流派達成了一項協定。玻利瓦爾工人工會力量(FSBT)的代表隨即宣稱，UNT（全國職工總會）不再代表革命的利益，也許有必要建立另外的工會組織。UNT（全國職工總會）內部的對抗，集中在與政府有關的"自主性"問題上，換句話說，就是工會對於政府的獨立性問題。在這一點上，公共論戰也用查韋斯（他用一個有些惡狠的方式表示了反對UNT自治的意見）反對CCURA和UNT的主要代言人。

[13]這特別是奧蘭多·契里諾的情形，UNT的國家協調員和他的政治傾向，聯繫到阿根廷社會主義左翼組織。

[14]"社會主義陣營"的形成帶有鄰近性和地方性，是PSUV的普通百姓結構。

（衛眾譯自《國際觀點》第397期，2008年2月號）

歡迎郵購 香港郵政總局信箱 10144 號

第四國際簡史	法蘭克著	14元
古巴革命戰爭的回憶	格瓦拉著	20元
匈牙利悲劇	弗萊雅著	8元
1968年法國革命	南燦譯	18元
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	曼德爾著	30元
雙山回憶錄	王凡西著	20元
我的回憶	陳碧蘭著	30元
托洛茨基文集	托洛茨基著	40元
馬克思主義與第四國際	曼德爾著	30元
第四國際文獻（第一卷）	兆立譯	40元
第四國際文獻（第二卷）	兆立譯	40元
第四國際文獻（第三卷）	兆立譯	40元
托洛茨基及其思想研究（第一卷）	劉家良等著	30元
托洛茨基及其思想研究（第二卷）	曼德爾等著	30元

（上接第 44 頁）

我們在此複製的文章“是作為對提交給一群古巴研究人員的問卷調查表的回答而起草的”，作者根據他自己的觀點填寫後以“古巴，兩難的未來——以菲德爾在哈瓦那大學的演說為基礎的關於古巴的討論”（2005年11月）的書名，由古巴評論雜誌《La Jiribilla（旋轉）》出版。副標題，注釋和提要是第四國際編者所加。

本文作者阿隆索，哲學家 and 古巴革命激進分子，曾經經歷過所有的古巴激進左翼運動，從20世紀70年代參與“思想批評”的討論到20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的美洲研究中心。這兩個機構在使最好的古巴革命思想具體化的時候都受到了政治和官僚的騷擾。1994年他和胡裏奧·卡蘭紫出版了《La economía cubana: ajustes con socialismo》（《古巴經濟：調節和社會主義》）。1998年，出版了《Iglesia y política en Cuba revolucionaria》（《古巴革命中的教會與政治》）

注釋

[1]在這篇演說裏，菲德爾·卡斯而羅說道：“革命可以獨自摧毀它自己，唯一不能摧毀它的是他們[美國，帝國主義]。但是，我們，我們可以摧毀革命，而這將是我們的失敗，如果古巴有成千上萬的不事勞作卻享有一切的寄生蟲”

[2]作者在這裏指的是切·格瓦拉在離開古巴之前發起的關於經濟問題的討論，這次討論極大地引起了歐尼斯特·曼德爾和夏爾·貝特蘭興趣。切的經濟學概念後來在蘇聯的壓力下被放棄。

（衛眾譯自《國際觀點》第386期，2007年2月號）



關於古巴的討論：對未來的快速一瞥

阿隆索（衛眾譯）

在菲德爾·卡斯特羅的領導下，古巴已經進行了將近半個世紀的革命社會主義建設。由於顯而易見的生物學原因，領導了奪權戰鬥並且建立了新社會基礎的那一代革命者就在最近的將來要退出歷史舞臺。繼承人問題已經不是什麼可能性的問題，而是一個無情降臨的事實。

直到最近，這個話題在古巴還是忌諱的，也許是為了避免這樣的推測顯露的對於（卡斯特羅）病情的猜疑。當我們被問到在菲德爾“不在”（一種不提及“死亡”一詞的委婉說法）之後將會發生什麼事情的時候，我們通常約束自己，給出機智隱晦的回答，或者回以空洞得可笑的判斷。我們保證所有事情都會一成不變，一如既往，古巴社會完全準備好了，“繼承人”已經就位而黨也將永垂不朽。

可以確定的是，我們並沒有採取足夠的時間來反省，對這個未來的公開辯論則更少；我們古巴人經驗過這個現實，還須經驗來臨的現實，我們把辯論放在了外國人手中，他們不一定是敵人，但是他們經常關心在古巴或者世界其他地方社會主義的未來。還有，這個問題，就象在其他很多問題上不止一次地發生過的那樣，本來是關於古巴事務的討論，通過出口轉內銷的方式出現在我們面前。

這一事件的重要性在於這樣一個事實對古巴人的影響，對建設一個公平正義高度團結的社會的道路的影響，社會主義者聲稱，半個世紀以來，這條道路被鮮明的個人化風格所領導，同等地關注該事業的總形勢和關鍵時刻決策。由於無法緩解的封鎖，為了保障生存，迫使古巴作戰略迂回，在全民遭受縮食節衣時要持守下去，而這個時候侵略威脅不但持續不去，而且時而加重，從而遏制了確保滿足大部分人口的基本需求的能力，這就是總形勢。如數家珍地概述這個國家已經經歷過的社會-經濟圖景是沒有必要的。我會儘量提及具體的事實，而不是價值判斷。

既沒有動機也沒有論據能夠預示古巴的社會主義計畫在菲德爾以後不能獨立生存。儘管如此，他從

做出政治決定的空間裏消失將會是古巴社會主義領導層將要經歷的最強烈的震撼。我認為沒有人會懷疑這一點，因此不需要任何其他考慮，所有的回答都不應縮小這一事實的意義。

集中領導

當我被問及對該前景的看法時，我的回答是：我無法預言將會發生什麼，但是我可以說明我希望發生什麼。我置自身於這個有幸反復考慮過的思想，是因為它關係到與所有我想要討論的問題相聯繫的未來。

我們革命進程的領導（這裏我確實不希望泛泛而論）是建立在雙重合法性的基礎上的。一方面是魅力合法性（在理論層次上，由馬克思·韋伯恰當定義過的範疇）。這種合法性是建立在一位歷史性領導人的能力和受到一致擁護的基礎上的，是菲德爾個人形象的體現，是獨一無二的和由於多方面原因而不能被繼承的，其中包括領導者的才幹和天賦。另一方面，是制度合法性，它建立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來採用的，又在20世紀90年代早期有所修改的政治和法律工具的基礎上，儘管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那些導致社會主義在蘇聯這樣強大的國家裏死亡的蘇維埃官僚政治的結構和功能的痕跡，其中仍然有某些方面是積極的，但是毫無疑問也有相當的缺陷。

在權力機構的這兩種合法性之間，顯而易見的是，魅力領導壓倒了制度層面。今天總司令（如果我的記憶沒有錯的話，這是唯一包括了所有權力的頭銜，而且由於在古巴軍銜的調整過程中已經成為榮譽軍銜，將隨著卡斯特羅的引退而消失）的權力是決定性的，既沒有受到共產黨中央政治局，也沒有受到古巴全國人民政權代表大會和古巴國務委員會內部的質疑。很明顯在軍隊裏也是如此，國家首腦在戰爭期間成為擁有全權的總司令。因此，顯然地和有意地，各決策機關同僚是權利平等的，它們起初也是如此被設計的，它們都服從個人的領導。

讓我們注意括弧裏面的內容，很多人注意到其明

顯的含糊其辭，依照該說法，儘管國家處於和平之中，但是在國家權利的範圍裏，一種源於戰爭狀態的形態佔據了主導地位。這意味著國家被迫處於戰爭中一樣度過了和平年代。

領導權如此集中已經導致了某些錯誤（對此我無法做出裁決），但是也實現了革命事業的一致性，一種關於統治權要與主張社會正義和團結之理想的生命力相一致的連貫性，這些理想在走過一段危險的旅程之後已經找到了它們的位置，並且在我們的大陸上得到了恰當的回應。但是爲了保住這些果實，發展新的成果，我認爲，權力機構需要進行改革。

理論上，最高政治級別的歷史性領導的消退會使這種領導形式向一種新型的關係轉變，在新關係下作出決定和設計戰略時，同僚權利平等的關係壓倒個人的意志。實際上，這就是憲法規定的：總統的地位並不高於國家，但是主持國務委員會工作，而且當他的意圖不能獲得大多數人支援的時候，他就應該服從大多數人。國家元首在國民大會面前的角色也應該是類似的情形。

這並不意味著國家元首不應立法，也不意味著人們不能做合適的制度改變。但這些改變決不意味著需要人爲地植入自由民主的模式，而是改變應當來自於系統的特殊需要，根據制度學派的觀點，系統的不足是因爲系統沒有給出所有它丟棄的東西。這等於是在說一個“外界建議”儘管用心良苦，但是幾乎不起作用的領域。

2006年11月17日菲德爾·卡斯特羅在哈瓦那大學主演講廳（Aula Magna）的突然出現打動了聽眾，因爲這件事表現出了以前沒有公開過的一些關切。^[1] 這些關切肯定困擾了這位偉大的政治家，他知道他來日無多了。從十月革命脫胎而出的社會主義實踐已經被證明是會有反復的。這場劇變打碎了革命不可逆轉的神話。在世界體系裏，後資本主義的權力中心已經被解除了武裝（而且地球上第二大核力量已經被扔到新自由主義大海上空的九霄雲外去了，陷於貧窮而不能自立）。

考慮到這個事實，即在歐洲不僅是革命實踐和它的理論失敗了，而且該挫敗也影響到了社會主義（甚

至是圍繞烏托邦建立起來的布爾什維克事業），對菲德爾第一次全神貫注地把注意力圍繞在我們自己的革命進程也可能反復這件事情上，就沒有什麼好吃驚的了。所有這一切本來被認爲是不可逆轉的。不是他們決定換另一種方式來做。不，是他們放棄了。這是一場激起了社會主義模式總危機的巨大災難。不是因爲它終結了，而是因爲很明顯需要採取另外一種思考方式，思索社會主義本身已經被證明也是會有反復的這個事實。

民主？

如果這種模式業已產生了毀滅它自己的萌芽，那任何社會主義實踐也都會產生這種萌芽。菲德爾相信，如果說革命不能從外界被摧毀，它卻可以被自己殺死的。他指出腐敗是帶來這種毀滅的罪惡的中心。我認爲他是對的，但是他沒有說出全部。而且我懷疑蘇維埃制度的崩潰是否主要是腐敗的結果，雖然腐敗肯定會出現在異化的結構裏。我相信，官僚主義和缺乏民主，這兩點對社會主義的破壞和腐敗對它的破壞一樣嚴重。而且我在此處提到的不是選舉制度，多黨對抗，競選活動或者行使權力的輪換。我說的是民主，我們還從來沒有在地球上創造出來過的民主，儘管我們自以爲我們瞭解關於它的一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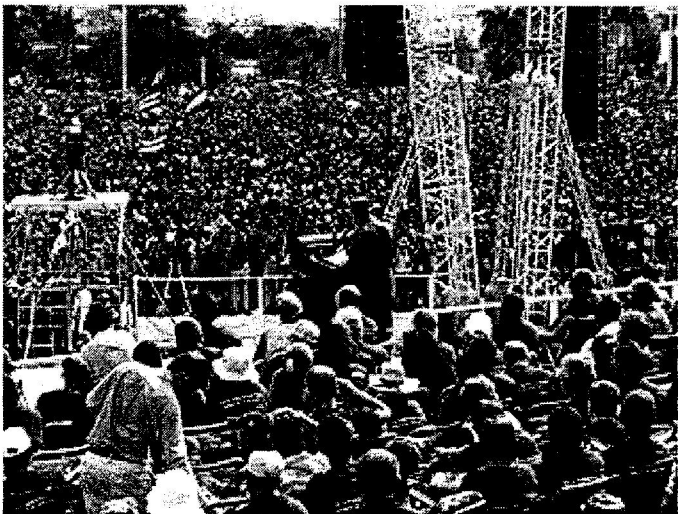
我們從來沒有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創造出過民主——重要的是把自己強加給歷史的那些東西——因爲在那裏民主充當的是市場和金錢帝國的支撐，是發財動力的支撐。這些動力製造我們稱之爲腐敗的東西，構成再生產的實質動力，從而把腐化的觀念降低到違反它自己的遊戲規則的地步。

我們也沒有在社會主義實踐中創造出民主。因爲讓人民有效地參與到決策機制中來的努力，儘管在某些情況下是值得稱讚的，但還是不夠。切·格瓦拉注意到“群眾應該有引導自己命運的可能，有決定積累什麼消費什麼的可能，經濟技術應該用於作這些選擇，群眾覺悟會保證它的執行”。這是一項長期工程，如果腐敗把我們淹沒，我們將達不成它。出於這個原因我們不僅應該把腐敗看作是一種犯罪，而且應該把腐敗看做是一個道德問題。因爲跟犯罪相比，成功的犯罪並不會保證受到抑壓禁止，而後來的腐敗會代替

眼前的腐敗。

只有在建設一個超越不平等和貧窮，並且不屈服資本暴政的和諧社會的意義上，才能明顯看到，作為民治民享民有權力的民主這一政治學範疇僅僅同社會主義相容，因為它已經表明——不象資本主義——社會主義沒有民主就不能維持下去。

我們應該使自己習慣這樣考慮問題，菲德爾沒有時間來找到一個能夠實際解決問題的方法，這不可避免地需要時間。很有可能將來的幾代人在面臨他們自己的問題時為缺乏他那樣的眼光而感到遺憾。和他生活在同時代的我們也是如此，我們會希望但願能找到應對今天我們面對的重大問題的實際答案。我相信他的情況亦然，這種合情合理的焦慮在他最近幾年的演講中已經很明顯了。



革命宮的五一國際勞動節集會

新情況 新挑戰

但是按照我的觀點，最重要的事情是考慮最近的事態發展。簡單地總結一下，社會主義的崩潰使得在帝國主義內部產生了幻象。他們迅速的崩潰，世界又開始經歷一波新的轉變。這一波轉變，要比我們已經瞭解的導致出現兩極世界的那一次更有希望，已經在拉丁美洲出現，擁有和古巴革命高度一致的推進器。這一事態已經注意到了菲德爾的古巴的開放，而菲德爾的古巴，也以多種方式，幫助了在美洲開始的轉變。瑪格麗特·柴契爾的那句著名的格言：“別無選

擇”——過去是用來為新自由主義辯護的，現在反過來對付它的創造者。今天對帝國主義和它的權力中心來說，不要說接受徹底改造的社會主義的進展，就是接受不同類型的資本主義也是很困難的事了。菲德爾·卡斯特羅不會在其現實世界裏經驗到撤退，作為一個單純的見證人，那個已經開始崛起的世界也不會希望他那樣。

範式的重建已經讓一些新預兆出現。沒有概念要被複製，沒有自主權要降貴吁尊，沒有利益居於從屬地位，也沒有領導要複製。我們繼承的是一個見習期的社會主義，它和以前經歷的社會主義不同，而菲德爾，在避開陷阱和困擾上比其他任何政治家都更有經驗，仍然能為我們提供幫助。

當然多年以來我們已經犯過一些錯誤，而且我們還會繼續犯錯誤，因為我們以為自己知道社會主義是什麼。更以為自己也知道民主是什麼。不僅於此，經濟學還確實遠遠不是一門精確的科學。當經濟學家們有意貶低把計量經濟學標準同非經濟學標準作對比的辯論時，滿懷科學激情的他們傾向於忘記，“政治經濟學”不是任意產生出來的。[2] 這不是古巴的地方病，甚至也不是社會主義特有的。最近以97歲高齡去世的約翰·肯尼斯·加爾佈雷思，因為他的理論從狹隘的經濟學框架出發走得太遠，甚至都沒有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提名。這麼做絲毫沒有考慮到他著作的質量和重要性，也對他是三任美國總統的顧問這一事實視而不見。但是很巧合地，看上去我們正好達成一致：我們需要創造發明21世紀的社會主義。

儘管有所有這些不足，社會主義古巴社會——即使這個術語首先要表達的仍然是它渴望成為什麼和它不是什麼——還是處理了一個智力問題，一個專門技術問題（按照流行的說法：一個“人力資本”問題），這對已經上了美洲大陸議事日程的改變來說是特殊的和決定性的。也開始從政治的，經濟的，社會學的和民族的前景構思未來。

沒有一個方面允許我們停止關注卡斯特羅以後的關鍵時期的我們自身。形勢不會象革命的敵人所想像的那樣發展，事實上，更有可能出現的是：他在死後仍然活在我們心中。（下續第 41 頁）

“2008 likely to be most difficult for China’s economy” -- on Wen Jiabao’s statements

Zhang Kai

In March 2008, Wen Jiabao, Premier of the State Council, presented the government report to the People’s Congress meeting, and stressed China’s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since the Reform and modernization efforts:

In term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China’s gross national product reached RMB 2.466 trillion yuan, an increase of 65.5% from 2002, at an annual growth rate of 10.6%. China has moved from the 6th to the 4th biggest economy in the world; the national revenue was 513 billion yuan, and foreign currency reserve was over USD 152 billion.

In terms of grain production, for four consecutive years, grain production had increased, reaching over 50 billion kgs.

In terms of trade and finances, the total import and export value reached USD 217 billion, rising from the 6th to the 3rd in the world.

However, at the press conference after delivering the Report, Wen Jiabao said: “This year is likely to be most difficult for the Chinese economy due to price hikes and high inflation.” It would not be easy to control CPI within 4.8%. China’s economy could not escape being affected by the sub prime rate crisis in the USA, the deflation of the US dollar, the high oil prices, and the massive vacillations of the global stock market. So, the difficulty for the Chinese economy lies in the many uncertainties both outside and inside China, leading to difficulties in policy making.¹

This is certainly contradictory, for while China’s economy seems to be doing very well, the greatest difficulties are taking place. This is an indication of the ineffectiveness and inadequacies of macro regulatory policies by the party in power, when the economy following the logic of the market gets out of hand.

According to the Director of the State Statistics Bureau, while GDP increased by 11.4%, CPI of 2007 increased by 4.8%, the highest in the last 11 years; the major factors were price increases in food (rising by 12.3%) and housing (by 4.5% in general, and by 7.6% in 70 big and medium cities). All social strata have been concerned with inflation. Entering 2008, the situation has gone for the worse. It was reported that CPI for the first two months of 2008 had increased by 8.7%.² In January alone, food prices increased by 18.7%, with pork rising by 57%, poultry and meat by 30-40%, vegetables by 13.7%, and fruits by 10.3%.³

Zhong Dajun, economist in Beijing, said that the CPI index published by the State Statistics Bureau was not reflecting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price rises. The CPI as felt by the general people in China in the last two years would be of two digits, and the situation resembled the eve of June 4, 1989, though at

that time, domestic factors were prominent, and now, there are intricate factors of the global economy, hence the developments would be even more unpredictable. Zhong Dajun pointed out that one major reason for the inflation was the flow of global hot money into China. It amounted to about USD 500 billion in 2007. He argued that the politicization of the question of the rise in the value of the RMB has caused a lot of hot money to come into China, and the authorities need to print more and more RMB notes in response, hence there is the accelerating inflation in China.⁴

In March, there are reports of not only rising food costs of 11% compared to the last month, but also shortages in fuel supplies in cities like Guangzhou and Wuhan.

One by-product of the capitalist market is social polarization. The Gini coefficient in China has risen from 0.16 before the Reform to the current 0.47. New middle classes have grown, and they are mostly from non-public ownership economic systems and freelance professionals. It is estimated that there are about 75 million people controlling or managing about 10 trillion yuan, and they contribute about one-third of the tariffs. It is expected that by 2010, they will contribute to 50% of the tariffs, 40% of the volume of import/export trade, 69% of publications, 65% of China’s patent rights. 80% of new products come from medium and small enterprises, and 95% of them are from the non public ownership sector. In terms of employment, over 90% of jobs are provided by the non state sector.⁵

With increasing grievances, social conflicts and struggles are more frequent. In 2007 alone, there were 100,000 instances of social confrontations, averaging 274 instances everyday. According to the All China Trade Union, labour disputes in 2007 amounted to 406,000 cases. Zhang Mingqi, the Deputy President of the All China Trade Union, remarked that labour disputes have increased by over 20% every year in the last few years.⁶

However much the party-state leaders pledge to tackle the aggravating social and economic problems, they will not implement any radical democratic reform. The majority of the people in China will continue to come under the tyranny of both the political system and the market. Any real change going from the bureaucratic political totalitarianism to socialist democracy will have to depend on the rise to struggle by the broad masses. 4 April 2008

¹ *Wen Hui Bao*, 18 March 2008.

² *Wen Hui Bao*, 30 March 2008.

³ *Apple Daily*, 20 February 2008.

⁴ *Ibid.*

⁵ *Wen Hui Pao*, March 9, 2008.

⁶ *Ming Pao*, March 15, 2008.

Changes in the CCP's evaluation of Trotsky and Chen Duxiu

Zhang Kai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had conducted a ruthless persecution of dissidents in its several decades of rule. Under pressure, in 1978, some verdicts were rehabilitated. However partial and selective the official rehabilitation was, historians have since responded with a probe into historical cases of wronged doings.

In No. 2, 2005 of the journal *Bainianchao* (*Tide of a Century*), a scholar Zeng Xianxin wrote an article entitled "The Chinese Trotskyists were not traitors". The article asserts that "after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by various sectors, many history researchers are negative about this issue [that the Chinese Trotskyists were traitors]."

In No.7, 2006 of the journal *Yanhuang Chunqiu* (*Annals of the Chinese People*), Ma Changhong wrote an article entitled "Changes i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evaluation of Trotsky". He points out that "For almost 80 years, among several generations, the word Trotsky or 'Trotskyists' was synonym with the words reactionary or counter-revolutionary. As early as October 1929, in 'The Party Central's Resolution on fighting opportunism and the Trotskyist opposition inside the party', the allegation was that the Trotskyist opposition 'has actively attacked and sabotaged the Party politically, organizationally, and in various aspects.' The phrase 'traitor Trotskyists' even appeared in Mao Zedong's famous essay 'On Protracted Warfare'.

The changes in the CCP's evaluation of Trotsky have subtly changed. In the 1952 edition of *Selected Works of Mao Zedong*, a footnote on Trotsky went like this: "The Trotsky clique was originally a faction against Lenin in the Russian workers movement. Later it degenerated into a totally counter-revolutionary bandit gang, The current Trotskyists are not a political faction within the proletariat, but a gang of assassins, saboteurs, spies, agents and murderers without principles or thoughts; they are a gang of deadly enemy to the proletariat, employed and used by foreign intelligence organs."

In the 1991 edition of the same book, the footnote on Trotsky changed to the following: "Trotsky (1879-1940) had served as Chairman of the Revolutionary Military Commission after the victory of the October Revolution. In November 1927, he was liquidated from the Party.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movement, Trotsky had conducted many splitting and sabotage activities."

In the above rendition, although the general evaluation of Trotsky is negative, the two major changes are that Trotsky's role after the October Revolution was added, and large amounts of slanders were deleted.

In the 1993 edition of Volume one of *Writings of Mao Zedong*, the footnote on Trotsky was further revised: "Trotsky (1879-1940) had served as Central Politburo member of the Russian Social Democratic Workers Party (the Bolsheviks), and Chairman of the Revolutionary Military Commission, etc. After Lenin died, he opposed Lenin's theories and lines on the building of socialism in the Soviet Union, and organized an opposition within the Soviet party (Bolsheviks), and conducted factional activities. In November 1927, he was expelled from the Party."

In this rendition are three changes: confirming Trotsky's leadership role in the Bolshevik Party; replacing the more derogatory word "liquidated" with the more neutral word "expelled"; and removing the allegation that Trotsky conducted splitting and sabotage activities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movement.

Furthermore, in 2002, in volume one of the new edition of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published by the official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Press, it is written that: "Some of Trotsky's understanding of the class nature of the two cliques of Chiang Kai Shek and Wang Ching Wei after the Great Revolution period, his judgement that they will be betraying the revolution, and his criticisms on the mistakes of Stalin in guiding the Chinese revolution were correct or basically correct;" "Trotsky thought that Stalin should be responsible

for the defeat of 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 However, the footnote retained the comment that “After Lenin died, he opposed Lenin’s theories and lines on the building of socialism in the Soviet Union.”

The most important change in evaluation can be found in the 1999 edition of volume 6 of *Writings of Mao Zedong*: “‘Trotsky (1879-1940) had served as Central Politburo member of the Russian Social Democratic Workers Party (the Bolsheviks), and the President of the Petrograd Soviet during the October Revolution. After the October Revolution, he had served as People’s Commissar for Foreign Relations, People’s Commissar for the Army and Marines, Chairman of the Revolutionary Military Commission, and member of the Comintern Executive Committee, etc. In October 1926, at the plenary session of the Soviet Party (Bolsheviks) Central Committee, his role as member of the Central Politburo was removed. In January 1927, the Comintern Executive Committee resolved to remove his role as Executive Committee member. In November of the same year, he was expelled from the Party. In January 1929, he was exiled from the Soviet Union. In August 1940, he was assassinated in Mexico.”

This rendition removed allegations that Trotsky “opposed Lenin’s theories and lines on the building of socialism in the Soviet Union,” and that he “organized an opposition within the Soviet party (Bolsheviks), and conducted factional activities,” allegations which were there in the original footnote. It listed all the important roles Trotsky had played during and after the October Revolution. It also used the word “assassinated” rather than words like “executed”.

It must however be noted that such changes, while reflecting a more objective and just evaluation of Trotsky’s life and activities, have not taken place in official CCP documents, hence the official rehabilitation is yet to come.

At the same time, there has been a wave of positive re-evaluation of Chen Duxiu, one of the founder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Trotskyist group in China, both in the academia, and in the general public. In the January 2008 issue of a CCP organ *Shanghai Party History and Party Building*, an article by Shi Zhongquan, former

deputy director of the CCP Central’s Institute on Party History, which was an academic report made by Shi in an academic symposium in December 2007 in Wuhan on the CCP history, wrote that it is not correct to put all responsibility of the Party’s mistakes in the last stage of the Great Revolution on Chen Duxiu himself. The main sources of his mistakes were from the Comintern and from the Party itself. Chen Duxiu’s contributions in his whole life were more than his demerits. Shi went on to list Chen’s contributions, including his pioneer work in promoting the New Cultural Movement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his founding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his leadership in the CCP for the first five Central Committees, enabling the CCP to grow from a 50-person membership to almost 60,000. Shi says that Chen had contributed much to the Marxist analysi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nd had been in the prison of the warlords and of the nationalist Party, and he had all his life waged a heroic struggle against the reactionary forces. Shi held that of the two main mistakes that Chen committed, the first one, that he took a rightist line in the last stage of the Great Revolution, it was a question of different lines within the Party and was not a question of being revolutionary or counter-revolutionary. As for the second mistake, that he was involved in the Trotskyist defeatist faction, that had to do with the intra-party struggle in the Soviet party; Chen had not jeopardized the Chinese people or the Chinese nation, and had not engaged in any espionage work. Shi concluded that Chen’s played 70% positive role and 30% negative role.

Shi’s last remarks were that it was time for an overall evaluation of Chen Duxiu’s contributions. 2009 would be Chen Duxiu’s 130th anniversary, and party historians should prepare for the rehabilitation of Chen Duxiu, restoring his party membership, and convening academic seminars.

The CCP had for long slandered Trotskyists as traitors and jackals of imperialism. On 22 December 1952, the CCP arrested all Trotskyists throughout China. Some of them were deprived of their freedom for two or three decades on charges of “counter-revolutionary”. Such wronged cases are still to be rehabilitated.

香港	2	特區政府向中共官僚傾斜的管治.....	仲明
	4	開放大氣電波，捍衛言論自由!.....	微波
中國	5	天災難阻 人禍須除.....	振言
	7	「今年恐怕是中國經濟最困難的一年」——析溫家寶的「直言」.....	張開
	10	西藏等地騷亂及其解決之道.....	軍行
	13	中共對托洛茨基和陳獨秀評價的轉變.....	張開
悼念	16	悼念老戰士李永爵同志(1921-2008).....	十月評論社同人
	17	羅麗萍三進三出牢獄(轉載).....	李永爵
	21	悼念老戰士章華同志(1924-2008).....	十月評論社同人
	22	戚·格瓦拉為革命獻身的一生.....	青雲(章華筆名)
	20	紡織工人之歌.....	青青(章華筆名)
	23	西風在吹.....	白田(章華筆名)
國際	24	迎合員警與自衛隊的日本最高法院 與警告日本政府違憲的名古屋高等法院.....	趙京譯
	25	廢除核武器的國際政治條件.....	趙京
	28	出席雪佛龍公司股東大會.....	趙京
	30	剛果：一個充斥著搶劫和壓迫的國度.....	衛眾譯
拉美專輯	31	厄瓜多爾：一次勝利的進軍 國家聯盟黨的壓倒性勝利.....	布蘭可
	32	厄瓜多爾：葛雷亞政府和新制憲大會面臨的挑戰.....	圖山特
	34	委內瑞拉的查韋斯：社會主義仍是我們的目標.....	富恩特斯
	36	委內瑞拉：處於帝國主義、憲政改革和社會主義十字路口的玻利瓦爾革命....	衛眾譯
	42	關於古巴的討論：對未來的快速一瞥.....	阿隆索
英譯	45	“2008 likely to be most difficult for China’s economy”.....	Zhang Kai
	46	Changes in the CCP’s evaluation of Trotsky and Chen Duxiu.....	Zhang Kai

OCTOBER REVIEW VOL.35 ISSUE 1 2008.6.28

Hong Kong	2	HK SAR Government orients towards the CCP’s bureaucracy.....	Zhong Ming
	4	Defend the freedom of speech!.....	Wei Bo
China	5	Behind the Sichuan earthquake disaster.....	Zhen Yan
	7	“2008 likely to be most difficult for China’s economy”.....	Zhang Kai
	10	Riots in Tibet and possible solutions.....	Jun Xing
	13	Changes in the CCP’s evaluation of Trotsky and Chen Duxiu.....	Zhang Kai
Obituary	16	Remembering veteran comrade Li Yongjue (1921-2008).....	October Review
	17	Luo Liping thrice in and out of jail (reprint).....	Li Yongjue
	21	Remembering veteran comrade Zhang Hua (1924-2008).....	October Review
	22	Che Guevara’s revolutionary life (reprint).....	Zhang Hua
	20	Song of the Weavers (reprint).....	Zhang Hua
	23	The west wind blowing (reprint).....	Zhang Hua
International	24	The Japanese law courts different political verdicts.....	(tr.) Zhao Jing
	25	International conditions for nuclear disarmament.....	Zhao Jing
	28	Being present at the Chevron Shareholders’ meeting.....	Zhao Jing
	30	Congo: a demonstration of plunder and submission.....	Miller and Toussaint
	31	Ecuador: A triumphant advance.....	Hugo Blanco
	32	Ecuador: Challenges facing Correa’s government.....	Eric Toussaint
	34	Venezuela’s Chavez: Socialism still our goal.....	Federico Fuentes
	36	Venezuela: The Bolivarian revolution at the crossroads.....	Borges, Garcia, Vivas
	42	Cuba discussion: A rapid glance at the future.....	Aurelio Alonso
Articles in English	45	“2008 likely to be most difficult for China’s economy”.....	Zhang Kai
	46	Changes in the CCP’s evaluation of Trotsky and Chen Duxiu.....	Zhang Kai